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pavilion with a multi-tiered, curved roof, partially obscured by lush green trees and clusters of small, light-colored flowers in the foreground. The sky is a clear, bright blue.

燕园网讯

2020年第2期 总第91期



目 录

■ 新闻动态

| | |
|---|----|
| 习近平回信勉励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 | 5 |
| 北大召开常委会认真学习总书记给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 2015 级本科班同学回信精神 | 6 |
| 北京大学春季学期线上开课 | 8 |
| 统一部署 上下联动——北大全力构建抗击疫情防线 | 10 |
| 北京大学研发的多源大数据疫情防控研判系统（PESA）为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 11 |
| 北京大学推出抗击新冠疫情继续教育公开在线课程 | 12 |
| 逆境相扶 风雨同舟 国际校友、师生、合作伙伴声援北大 为中国抗疫加油 | 18 |
| 陆林院士团队在 Lancet 发表通讯文章《精神心理健康助力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 | 24 |
| 校领导看望慰问圆明园校区留住学生和一线值班人员 | 25 |
| 防控疫情不停学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全力做好“延期不停教、延期不停学”工作 | 26 |

■ 网教之声

| | |
|---------------------------|----|
| 社交媒体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挑战与机会 | 30 |
|---------------------------|----|

■ 北大人物

| | |
|-------------------------|----|
| 严仁英：投身预防保健 助力生命绽放 | 55 |
|-------------------------|----|



医者钟南山61

■ 学者谈读书

张翎：文学是永远不会枯竭的.....73

朱永新：朗读者，读出时代心声75

■ 好文共赏

国家疫情治理史上的北大往事|北大新青年77

■ 史苑钩沉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历史沿革86

■ 大美北大

四月底的北大，将繁花似锦.....89

■ 学员心声

共克时艰 守护家园——在社区抗疫一线的网教学生.....97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章政、李胜

副主编：杨虎、舒忠飞、屈兵、

白彦、李建新

执行副主编：常靖、王凝

编委会成员：曾玉芬、王姗姗、

郑鹁、石传芬

资料提供：唐海峰、杨舒婷、刘

晴晴、孙叶敏、王帅、王迎春、

王蓬蓬、林以晴、高前余、张翼、

吴丹、王凯惠、吴晓风、徐燕、

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编辑寄语

2020年的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力战病毒。我们新的学期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期开始了，我们继教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挥专长，及时推出了疫情防控相关的公共在线课程。本期新闻动态栏目对此公共在线课程做了详细报道。

北京大学医学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争中，前后分三批派医护人员、专家前往武汉一线，发挥专长，救死扶伤，守护我们美好家园，他们是我们北大人的骄傲，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祝福，静候他们平安归来。本期史苑钩沉栏目将带领大家去认识和了解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历史沿革。

本期大美北大栏目送你一片燕园里的繁花盛开，让我们一起期待，愿你平安健康，无论何时归来，都不算晚……



■ 新闻动态

习近平回信勉励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

医学院学生

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月21日给正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回信，肯定他们献身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志向，勉励他们练就过硬本领、服务基层人民，并向他们以及藏区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17名同学在北京进行临床实习期间，既锻炼了临床基本功，也坚定了献身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信念，我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医生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军地广大医务工作者冲锋在前、英勇奋战，用行动诠释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

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

2019年6月，在对口支援高校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安排下，西藏大学医学院2015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班的17名学生来到首钢医院，开始为期11个月的临床实习。不久前，这些学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实习以来的收获和感悟，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以及学好本领后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决心。

习近平给在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的回信

西藏大学医学院2015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同学们：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得知你们17名同学在北京进行临床实习期间，既锻炼了临床基本功，也坚定了献身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信念，我很欣慰。



医生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军地广大医务工作者冲锋在前、英勇奋战，用行动诠释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

藏历新年就要到了，我向你们以及藏区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习近平

2020年2月21日

编辑：山石

来源：北大新闻网

北大召开党委常委会 认真学习总书记给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 2015 级本科班同学回信精神

2020年2月22日晚上8点，北京大学在燕园大厦召开党委常委会，集体学习了总书记给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15级本科年级的17名同学的回信。党委书记邱水平，党委副书记、校长郝平等学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参加，邱水平主持会议。



会议现场

在认真学习总书记给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的回信后，邱水平强调，在举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总书记在百忙中给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的西藏



大学医学院本科生回信，这不仅是对藏大师生的亲切关怀和慰问，也是对广大医学生、广大奋战在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极大鼓舞和激励，这对我们全力打赢抗疫总体战和阻击战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同时，我们要把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和继续做好对口支援等各项工作相结合，以立德树人指引方向，培养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郝平指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北大对口支援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北大医学、北大对口支援西藏大学工作的鼓励与肯定，特别是对此刻正奋战在抗疫工作中的白衣战士辛勤奉献的高度肯定。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回信精神，要把总书记对青年学生的鼓励和期望迅速传达到每一位学生。

常委会结束后，晚上9点，在北京大学二教109教室，邱水平，郝平，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宝剑，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等与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2015级17名本科学生举行座谈，共同学习了总书记的回信。邱水平和各位领导分别发言，勉励同学们认真学习总书记回信精神，牢记嘱托，坚定信念，学好本领，以仁心仁术造福群众。



校领导与同学们交流

校领导还向同学们送上了藏历新年的祝福。同学代表发言表示非常激动，深受鼓舞，一定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努力学习，身体力行，做一名总书记希望的合格的医学生。

摄影：王天天

编辑：山石

来源：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春季学期线上开课

疫情无法阻挡春天的脚步。2月17日星期一，北京大学2020年春季学期如期线上开课。本学期，2613门本科生课程和1824门研究生课程，将采用直播、录播、慕课、视频会议、专属定制（SPOC）等多种网络教学模式如期开展。北京大学充分利用线上教学优势，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与学改革创新，推进学习方式变革，实现了“延期不返校、延期不停教、延期不停学、延期不停研”。

上午10时，校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龚旗煌、副校长陈宝剑等校领导，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来到老地学楼查看新学期开课情况。



校领导查看线上教学工作

校领导一行首先查看了教室授课直播情况。在老地学楼113教室，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黄建滨老师和助教正做着“物理化学”课程的准备工作，试用投影设备、试放PPT。在103教室，数学科学学院的赵玉凤老师正在黑板上书写数学公式，这是课程“高等代数”的教学现场。但和以往课堂不同的是，两间教室里却没有一位学生，这是授课老师“一个人的课堂”。



黄建滨做“物理化学”课程的准备工作

这两门课程采用的是教室授课直播——教师利用地学楼智慧教室系统，在教室按课表时间上课，以网上直播的方式播出，学生在北大视频直



播平台上同步学习。教师同时在网上布置作业、批改作业、组织答疑，课后学生还可以观看视频回放。疫情防控期间共有 37 门直播课堂课程，涵盖数学、物理、化学、中文、法律、经济等学科。

在老地学楼二楼的学校网络教学指挥调度中心的大屏幕上，法学院的唐应茂老师正通过“在线课堂”给本科生们讲授“国际金融法”课程，外国语学院的付志明老师正在带领学生们学习“基础阿拉伯语”，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毛善君老师正在给同学们上“地学数学模型”……授课老师和同学们都在电脑摄像头前，相互之间可以看到对方的面容、听到对方声音；老师认真授课，同学们也积极参与互动。因为疫情不得不相隔千里的远程教学，在这里仿佛消弭了距离，大家的热情和动力溢于言表，让线上课堂热闹又生动。

线上教学的高效有序让校领导们印象深刻。邱水平表示，全校师生在短时间内克服重重困难，团结一心，密切合作，推动了春季学期课程的如期开展，为北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代表学校向一线教师和各院系部门的周密筹备，以及同学们的配合理解表示感谢。邱水平希望各院系和职能部门能够在线上教学中注意收集反馈意见，充分挖掘各方资源潜力，继续完善线上教学模式，并积极探索未来教学发展方向，为北大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助力。

郝平肯定了学校的在线教学工作。他表示，首先要向全校师生对学校政策的理解和配合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积极参与准备课程的老师们和辛苦工作的技术人员们表示敬意。他指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学校和相关部門要继续密切关注师生的意见建议，及时发现和反馈问题，做好教学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也希望各位同学、各院系的教师和各职能部门的同志相互理解，一起努力，共同探索，共克时艰。

据统计，2020 春季学期本科生课程采用直播授课的课程最多，有 1116 门，占 42.7%；研究生课程选择研讨授课和直播授课的课程最多，分别有 541 门和 529 门，占 29.7%和 29%。其



他课程则选择录播、慕课、专属定制（SPOC）等多种教学模式。目前，新学期线上课程正在有序开展。

文字：新闻记者 高雷

摄影：王天天

编辑：麦洛

来源：北大新闻网

统一部署 上下联动——北大全力构建抗击疫情防线

自北京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以来，全校各单位立即行动、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快速构建起了抗击疫情的工作体系，并第一时间向师生员工发布了一系列及时准确、暖心贴心的通知提示。

争分夺秒，立即响应

26日下午，按照北京市的统一部署，学校立即研究，与北京市同步发布了学校《关于推迟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的通知》，明确指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任务的重要性，对推迟开学做出具体要求。

迅速召开疫情防控专项工作会议，学习传达上级指示和部署，要求全校各单位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和行动，周密部

署安排，采取坚决有力举措，做好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迅速成立北京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14个专项工作小组，加强对全校各单位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落实，制定《北京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以及14个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各项举措。

统一部署、全面动员

自1月25日起，连续印发了《北京大学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关于要求全校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全天在岗工作的通知》《关于发挥全校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以及《校领导联系基层单位防疫工作分工方案》，向全校各单位发出紧急通知部署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号召全体师生员工行动起来，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投入抗疫工作。全校各单位积极响应，上下联动，形成了全面的工作方案，建立起抗击疫情的工作体系。

上下联动，稳妥推进

抗击疫情以来，全校各单位通过网络平台向师生员工发布了校园秩序、学生事务、涉外工作、人事安排等相关通知，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了缜密、细致、得力的部署，确保疫情防控不留死角、防控工作稳妥有序。

截至目前，学校制定工作方案、发布通知合计100个，转发上级文件9个。其中，制定校级工作方案8个、14个专项方案，发布校园秩序相关通知5个、学生事务相关通知11个、外事人事相关通知15个、其他通知16个，医学部制定方案和发布通知31个。

全校各单位正按照工作方案、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投入抗击疫情工作当中，全力以赴、共克时艰，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编辑：白杨

来源：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研发的多源大数据疫情防控研判系统（PESA）为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围绕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面临的数据单一、覆盖面小、缺少综合研判分析系统等问题，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系王腾蛟教授、陈薇副研究员领导的科研团队，充分利用数据库和数据挖掘等技术优势，成功研制开发了多源

大数据疫情防控研判系统（Pneumonia Epidemic Situation Analyst, PESA），为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开发的数据采集、提取和集成系统工具，构建了国家



疫情发布数据库、微博疫情求助数据库、大规模疫情防控舆情数据库和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库等 4 个数据库，研发了多个用于预测分析的计算模型和应用，包括防控政策研判、感染人群特征分析、医疗物资供应分析和各地发病因素分析。

受国家相关部委委托，根据当前的疫情防控工作，科研团队应用该系统，

定期生成《疫情防控政策研判报告》和《疫情预测分析日报》，及时上报有关部门，为国家疫情防控指挥提供可靠的大数据决策支持依据。

编辑：山石

责编：白杨

来源：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推出抗击新冠疫情继续教育公开在线课程

庚子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万众一心，形成了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攻坚的关键期，在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继续教育部的指导下，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于 2020 年 2 月面向公众，推出北京大学抗击新冠疫情继续教育公开在线课程。课程面向公众，涵盖健康和心理、政策和管理应对系列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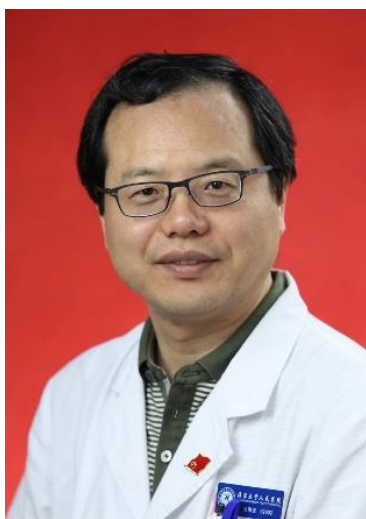
题，包括疫情防控知识和要点、心理建设、防疫营养助力、经济发展影响和政策应对、防控中的法律常识、应急管理舆情应对、企事业单位战略管理和国际关系视角看疫情等九门课程，希望以此促进公众在疫情下理性思考，注重生命关怀，帮助公众以科学精神防控疫情，助力每一位公民不只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风雨中成长，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

课程结构体系

系列一：健康和心理调节专题

课程主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及如何防控

主讲人：张海澄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医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副会长

课程内容：本课程从五个方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及如何进行防控进行了讲解。

- Part 1：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及防控
- Part 2：怎样进行自我防护
- Part 3：如何洗手
- Part 4：居家隔离的注意事项
- Part 5：回答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

课程主题：重大疫情环境中的心态和思维调节

主讲人：韩菁



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治疗硕士、博士

先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卫生研究所及多家培训咨询公司担任心理治疗医师、咨询师、高级培训讲师

课程内容：本课程从三个方面对重大疫情环境中的心态和思维调节进行讲解。

- Part 1：疫与病的区别，什么是疫
- Part 2：理性认识疫情
- Part 3：如何克服我们的恐慌



燕园网讯

现代远程教育校园文化讯息摘编

课程主题：跳出家庭沟通“三雷区”

主讲人：吕帆



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现任校新闻中心电视台副台长，《口语传播》、《创新思维与表达艺术》等课程主讲教师，央视《朗读者》、《故事里的中国》撰稿人。

课程内容：

Part 1： 亲密关系沟通中的常见误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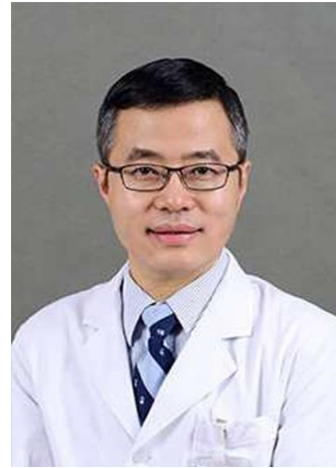
Part 2： 雷区一： 自闭模式

Part 3： 雷区二： 把天聊死

Part 4： 雷区三： 即兴表达

课程主题：防疫生活与营养助力

主讲人：陈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博士学位，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营养与代谢管理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委员，老年学组副组长。

课程内容：

Part 1： 一般人群营养膳食指导

Part 2： 特定人群营养膳食须知

Part 3： 特定人群营养膳食须知



系列二 政策和管理应对专题

课程主题：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
发展和政策应对

主讲人：章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经济学家。现任北大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社会信用研究重大攻关课题首席专家，曾任北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课程内容：

本课程对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应对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同时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参考。目的是为了全面地做好疫情防控和接下来的应对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的影响和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Part 1：疫情特点与经济影响

Part 2：当前需要注意的问题

Part 3：主要应对政策和措施

课程主题：新型冠状病毒防控中您
该知道的法律知识

主讲人：王岳



法学博士，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课程内容：

本课程介绍了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面向大众普及传染病防控措施和相关的法律责任，目的是希望从每个人做起，能够了解疫情防控相关法规，守法依规，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减少疫情的影响和冲击。

Part 1：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
介绍

Part 2: 传染病防控措施与相关法律责任

课程主题：大规模突发冲击与企事业单位战略管理

主讲人：宋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政策与政企关系、公共组织战略管理、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日本经济。

课程内容：

本课程阐述了大规模突发冲击下企事业单位战略管理的有关理论和实践要点。

Part 1: 导论

Part 2: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公共组织战略管理理论的异同

Part 3: 控制不确定性：大规模突发冲击下企事业单位战略管理的要点

Part 4: 大规模突发冲击下的战略管理

课程主题：从新冠肺炎疫情事件谈应急管理中的舆情应对

主讲人：夏诚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社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法学会研究会副会长。原中央维稳办副主任。长期从事政法维稳工作和社会风险治理的研究工作。

课程内容：

Part 1: 前言

Part 2: 当前抗疫期间的舆情状况

Part 3: 几起典型的舆情危机事件

- Part 4: 舆情危机事件显著的特征
- Part 5: 参与舆情事件的动机分析
- Part 6: 舆情危机事件的个体认知
- Part 7: 舆情危机事件的管理应对

课程主题：从国际关系视角看新冠疫情的影响与全球合作前景

主讲人：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外交部党校教授，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贸易与投资

全球议程委员会委员；G20 系列会智库峰会 Think20 委员。

课程内容：

- Part 1: 新冠疫情的国际冲击与影响原因
- Part 2: 疫情与国际公共卫生合作
- Part 3: 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与抗疫努力的不同反应与分析
- Part 4: 中国抗疫与中美关系
- Part 5: 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经济的未来影响

收听收看网络地址：

<http://pxkc.pkudl.cn/gkk/index.html>

或查看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微信公众号“学员服务”目录下的“抗疫公开课”栏目。

编辑：山石

责编：白杨

信息补充：姗姗

来源：北大新闻网



逆境相扶 风雨同舟

国际校友、师生、合作伙伴声援北大 为中国抗疫加油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抗击疫情牵动着全世界的心。近期，北京大学收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师生校友、合作伙伴等表达的慰问和给予的支持，他们积极评价中国抗击疫情采取的举措、防控工作取得的进展及北京大学在防控中做出的努力，并通过多种方式和北大师生、中国人民一起共同抗击疫情。

思源同心：各地留学生校友为抗疫助力

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校友千方百计寻找医疗物资，运送防疫用品，募集爱心钱款，表达鼓励支持，竭尽所能助力中国战“疫”。

1月底，以色列校友高佑思动员各方力量通过购买、受赠等方式筹集10万多只口罩、5万双医用手套、7000套医用手术衣，总计200多箱，重量近1吨，这些物资已于2月9号下午到达了黄冈市中心医院。

1月30日，北京大学泰国校友会（筹）倡议，组织北大泰国校友为中国武汉抗控病毒肺炎疫区捐款，徐珍珠、林夏妃、洪健城等代表的21位泰国校友和中国校友一起采购支援物资，先后向湖北支援第一批3500个口罩、第二批5563个口罩和5000医用手套。

2月13日，北京大学蒙古留学生校友、现任蒙古商会副主席赵勒成发起“中国加油”募捐，蒙古商会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捐赠140,000,000蒙图，赵勒成校友表示将继续积极为中蒙两国多作贡献。

2月14日，北京大学日本国际校友会发来“关于中国新型冠状肺炎援助事宜”倡议书及捐赠名单。自2月5日发起倡议以来，名单上的捐赠者不断增加。同时，北京大学日本国际校友会从会费中另捐35万日元，以上款项一并捐给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用于“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援助事宜”。

全球留学生校友还通过视频、电话等多种方式，表达对学校的关心和对抗疫的支持。

马拉维联合民主阵线主席阿图佩莱·穆卢齐（Atupele Muluzi）校友表示，他们赞赏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中的卓越表现，仅用十天在湖北省新建两所医院，及时有效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报疫情、提供预警及采取相关防控措施。中国政府在预防病毒传播方面采取的果断有效措施也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积极肯定。作为马拉维前卫生部长，他坚定支持并赞赏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

巴基斯坦巴中学生会执行主任穆斯塔法·海德尔·赛义德（Mustafa Hyder Sayed）校友表示，病毒和疾病的传播是不分国界的，世界人民须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挑战。疾病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它向来没有面孔、不分国界、没有宗教信仰。在经历了此次挑

战之后，中国将变得更为强大，期待着与中国开展密切的合作。

韩国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池晚洙（MansooJee）校友表示，希望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缓解社会上不必要的恐慌情绪，还希望世界能认识到并借鉴中国在此次公共卫生事件中体现的高度责任感及相关有益经验，坚信在克服此次难关后中国将更为强大。

马达加斯加公共安全部特别顾问罗斯当（Jean Rostand Rabialahy）校友表示：“你们不是独自在作战，你们有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朋友，我们支持你们。我们非常有信心，中国将赢得这场斗争，我们将一起赢得这场战斗！我们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共渡难关，一定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同情相成：全球国际师生为抗疫加油

外籍教师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一方面通过视频、邮件等方式，对北京大学和中国抗击疫情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和积极鼓励；另一方面，对抗击疫情工作提出很多非常宝贵的建议；同时，认真开展网络教学，为学生提供优质课程。



国际法学院 C. V. Starr 讲席教授、跨国法研究中心主任、2018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 Francis Snyder 指出，中国积极维护公共卫生安全，耐心细致的防控工作为今后世界各地应对此类疫病挑战提供了有益经验。在疫情面前，北京大学不仅尽全力确保每一位北大人的安全，同时通过网络开展各项教学科研工作，表现出色。此次疫情防治带来三点启示：第一，大学、各类学校、媒体以及社会组织应充分发挥作用，针对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潜在关联开展更多专题研究和教育普及工作。第二，国家需要出台针对食品安全、公共设施和市场管理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尤其要严抓食品市场管理，严格区分日常食物和野生动物；同时，注重提高公民行为准则、道德准则和社会责任感同样重要。第三，应该建立透明的、标准统一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机制，中国应带头建立这一标准，北京大学也应积极参与其中，贡献力量。

访问讲席教授、前沿计算研究中心主任、1986 年“图灵奖”得主、2016 年“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 John

Edward Hopcroft 表示，北京大学一直以来以学生为本，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也心系每位同学的安全。在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学生虽不能返回校园，但是高质量的教学视频线上学习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2014 “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 Donald David Stone 坚信，通过科学家们积极研发疫苗等多方面努力，势必打赢这场战“疫”。以往的经验表明，任何疫情最终都得以遏制，但全人类必须要从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对抗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

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外籍专家马场公彦表示，日本应该学习中国的经验，防止病毒蔓延，加强防控措施。通过此次疫情认识到中日两国是同住在“命运共同体”的邻家，因此日本全国各界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精神下向中国人民奉献“物”与“心”两方面的不断支援。学校 2 月 17 日正常开始了新学期工作，采取全校在线工作，这对应对类似突发事件是十分重要又难得的经验，是恢复平



常学习和研究节奏、保持精神健康十分有效可行的措施。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2018年“燕园友谊奖”得主、中西比较哲学家、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安乐哲（Roger T. Ames）提到，北京大学在应对疫情方面的措施非常明智，必须以更加务实的态度面对现状。中国在控制疫情扩散方面采取的行动令人赞许。疫情的发生是不幸的，但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为应对这类突发事件提供了远胜于其他大多数文化的人力资源。大家应该更具有同理心，而不是如此残忍和冷漠。疫情的扩散并不会止步于一国国境，大家应当意识到生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广大留学生积极行动，在疫情防控中贡献力量，并努力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防控工作的偏见和误解。

2月6日，约旦留学生、中阿卫视实习生丽丽与其师兄马尔万通过微信组织了一场由30位约旦留学生参与的“支持中国武汉”募捐活动，并购买了口罩等医疗物资寄到武汉。他们希望通过此活动表达对中国的爱与支持。

2月10日，韩国留学生洪麟、张允瀚、吴贤重发起“关于支持武汉疫情的募捐信”，为中国武汉的疫情防控提供支持。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的传播，孟加拉国内出现了一些假消息。北京大学孟加拉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阳光在国内接受媒体采访，及时向孟加拉民众讲述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澄清不实传闻。

风月同天：海外姊妹高校和合作机构声援抗疫、提供支持

多所外国合作高校及机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致信北京大学，积极评价抗疫工作，同时表达对北京大学全体师生的支持与问候。

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玛莎·波拉克（Martha E. Pollack）对北京大学师生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的努力给予积极评价。同时康奈尔大学在校内举办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圆桌讨论，对于疫情的复杂性进行了跨学科探讨，并明确提出需要警惕和谴责可能发生的歧视行为。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校长安德鲁·迪克斯（Andrew J Deeks）表



示，新冠病毒不仅仅是中国目前最为关切的问题，世界范围内的大学都应该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大学在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方面的优势，深入开展实验室和临床领域全面合作。该校作为国际病毒研究联盟的成员，愿意为中国的病毒防控与治疗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指出，中国政府对于疫情的果断应对以及与 WHO 的密切合作令人印象深刻，相信中国各地支援湖北的医疗团队能够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当前的疫情。同时，悉尼大学愿意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以支持北京大学在应对疫情中所做的工作。

东京大学校长五神真（GONOKAMI Makoto）向所有为了阻止病毒进一步扩散而做出努力的人表达感谢和敬意，希望疫情可以尽快过去，东京大学将会尽可能地提供支持帮助。

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田中爱治表示，日本目前也发现了多名感染患者，日本政府正在全力以赴控制疫情的扩散。早稻田大学会确保全校来自

中国（含港澳台地区）的留学生的生命安全，并确保他们在学校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为了共同抗击本次疫情，早大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一道，共渡难关。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校长斯图尔特·麦卡琼（Stuart Mc Cutcheon）表示，这是一场所有人共同面对的困难，更是一个我们应该通过合作共同应对的难题。受限于当地政府的旅行及海关禁令，将有近 2000 名中国学生暂时不能返校学习，其中也包括很多北京大学学生。奥克兰大学会根据每名学生的具体情况，妥善安排他们的学业，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恢复正常教学。

明治大学校长土屋惠一郎表示，面对此次疫情，北京大学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并多次派遣医疗队赴武汉服务，他对此深感佩服。今天的奋斗，就是未来的历史，相信春天马上到来，希望两校友谊长存。

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主席、洛杉矶加州大学校长基恩·布洛克（Gene Block）和联盟秘书长楚明伟（Christopher Tremewan）共同表



示，北京大学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在当前的形势下，联盟各成员都愿意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共同化解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并愿意通过在国际健康、校园安全领域的直接合作提供帮助。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事务助理总干事菲尔明·爱德华德·马可托（Firmi Edouard Matoko）、社会与人文科学助理总干事诺达·阿尔纳什夫（Nada Al-Nashif）、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小野三太（Santa Ono）、阿尔伯塔大学校长杜文彬（David Turpin）、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校长阿舍·科恩（Asher Cohen）、特拉维夫大学校长普锐理（Ariel Porat）、新西兰梅西大学副校长斯图尔特·莫里斯（Stuart Morriss）、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副校长茱蒂丝·乐美尔（Judith Le Maire）、法国泰雷兹集团北亚区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贝杰鸿（Jerome Bendell）等大学、国际组织、企业等相关机构负责人也

纷纷向北大师生表达亲切慰问和衷心支持，希望中国尽快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

危难有情：各地孔子学院师生送上美好祝福

一场疫情，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各地孔子学院的师生，用各具特色的方式，传递着希望与温暖，为中国人民加油打气。“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师生们操着不同的口音，却用同一种语言说出同一句祝福，他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却是最懂中国的外国人。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胡安·西鲁埃拉（Juan Ciruela）说：“我想告诉所有的中国朋友，中国人一定能克服当前的困难，中国有能力渡过难关，中国加油！”孔院的小朋友们也定制了专属祝福，他们对中国小朋友们说：“我们支持你们！我们爱你们！你们是战士！加油！”“不要失去希望和信心，相信终有一天疫情将被战胜！为所有的医护人员加油！我们的爱与你们同在！”

编辑：凌薇

责编：白杨

来源：北大新闻网



陆林院士团队在 Lancet 发表通讯文章《精神心理健康助力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疫情的防控和对社会的影响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面对迅猛增加的确诊和疑似病例、过载的网络信息、紧俏的防护物资，人们开始担忧、焦虑，甚至出现过度恐慌、抑郁等应激反应。

2020年2月7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院士团队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Lancet 在线发表题为“2019-nCoV epidemic: address mental health care to empower society（精神心理健康助力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通讯文章。文章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内外发展态势，以及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公众及医务工作者面临的精神心理压力，并着重介绍了我国政府为有效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公共卫生应急干预及为保障公众精神心理健康采取的积极措施。

该文章提出了六项应对精神压力的建议：其中包括评估所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加强社会支持系统（例如家人和朋友），消除与流行病相关的谣言，在安全条件下维持正常生活，积极使用心理社会服务系统，特别是针对医护人员，患者，家庭成员和公众的电话和互联网咨询。这些建议，对于抗击疫情有非常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该文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及时发声，呼吁关注公众和医务工作者的精神心理健康，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在相关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取得的宝贵经验，对抗击疫情、共克时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编辑：白杨

来源：北大新闻网

校领导看望慰问圆明园校区留住学生和一线值班人员

2020年2月2日下午，副校长张平文来到圆明园校区，调研圆明园校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春节期间留住在校区的学生，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员工。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章政、党总支书记李胜、副院长屈兵等陪同。

继续教育学院圆明园校区管理办公室主任段艳平汇报了校区疫情防控工作：自1月26日起严格实施校门管控，执行对留住学生、全体员工的健康情况每日报告制度，制定了圆明园校区疫情防控工作实施细则，全面加强校区的消毒和保洁工作。



张平文（右二）调研圆明园校区疫情防控工作

张平文肯定了圆明园校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并为学生和员工带来了疫情防控急缺的口罩等物资。他关切地问学生“每天吃饭问题怎么解决的”“吃的好不好”“有什么困难”等关乎学生健康生活的细节问题。对于校区目前面临的餐饮安排落实等困难，张平文指出，学校将继续想办法，尽快解决校区内的餐饮供应问题，并再三嘱咐学生要注意饮食、注意身体、做好防护，嘱咐圆明园校区员工做好防护、共克艰难、服务为本，确保疫情防控工作精准到位、扎实有效，努力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氛围和环境。





张平文与留住学生和楼长交谈

编辑：白杨

来源：北大新闻网

防控疫情不停学-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全力做好“延期不停教、延期不停学”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教育部“停课不停学”重要措施。北京大学在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领导小组，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正常开学和课堂教学造成的影响，发布《关于推迟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的通知》和《北京大学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网络教学安排》等通知，提出充分利用线上教学优势，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与学改革创新，推进学习方式变革，实现“延期不返

校，延期不停教，延期不停学，延期不停研”。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积极响应学校要求，学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开展各项工作，调整工作方式，提前做好工作规划和应对方案，全力以赴应对疫情，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和“延期不停教、延期不停学”相关工作，确保2020年春季学期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一、统一部署、提前规划。

学院疫情防控领导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学院疫情防控工作，统一部署，对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提前做好



规划。通过对学院网络学历教育、夜大学业余学习情况和学生情况进行摸排调查，提出确保网络学历教育正常进行，利用网络教育手段进行夜大学教与学，坚决响应“延期不停教、延期不停学”的工作方针。2月初，学院教学研办公室、教学管理办公室以及技术保障办公室等部门相互配合、形成合力，针对网络学历教育和夜大学教学活动分别制定疫情应对教学方案。

针对网络学历教育，在确保正常开课的基础上，根据《网络学历教育2020年春季学期教学工作安排》的要求，对部分工作进行调整以适应疫情的变化。包括调整补考时间、重新规划辅导答疑安排、明确教学及教务管理人员工作要求等。

针对夜大学业余学习，调整夜大学2020年春季学期校历安排，延迟开学报到注册时间，取消2月底补考考试，制定夜大学在线教学工作方案、技术方案和在线教学课表等。

同时，提前将调整后的安排和通知及时发送给所有同学，让所有同学做到心中有数，与学院一起共同应对

疫情期间的教与学。



关于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历教育应对疫情的通知

各位同学：

结合目前疫情防控情况以及2020年教学工作安排情况，特对夜大学教学情况通知如下：

1. 疫情防控期间，根据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以及学院教学研办公室通知，推迟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开展“停课不停学”教学活动，疫情防控期间面授课转为在线授课，恢复面授课时间另行通知。请各位同学在未接到面授课恢复通知前不要前往学校。
2. 疫情防控期间的课程全部采取在线授课的方式进行，具体安排请见附件1《2020年春季夜大学在线授课课表（学生）》和附件2《夜大学2020年春季学期校历》，具体上课网址及操作说明另行通知。
3. 关于2018级夜大学交费，夜大学交费采用网络平台交费的形式进行，各位同学可正常交费。
4. 关于夜大学注册，推迟夜大学注册时间，待学校恢复上课后统一进行注册。
5. 夜大学补考考试，推迟进行原定2月29日和3月1日进行的补考考试，具体时间视疫情情况而定，确定后将第一时间通知。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充分做好自身防护，及时关注班主任老师发布的通知，如有任何关于学业的问题请及时与班主任老师联系。

教学管理办公室
2020年2月13日

相关通知



二、狠抓落实、保证质量。

在明确教学方案和工作计划后，学院各部门积极行动，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1. 保证网络学历教育教学辅导工作顺利开展。学院在寒假期间通过各种方式联系辅导教师，确认辅导教师情况及开展工作的可行性，同时积极为辅导教师备课及开展教学工作提供支持。有的老师因疫情防控，无法按时回京，学院积极为老师协调笔记本电脑及教材电子版等资料，以确保能够正常开展教学辅导工作。

2. 保证实时在线答疑辅导顺利进行，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联合技术保障办公室多次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研讨解决方案，采取集中在线培训与单独辅助的方式，协助辅导教师开展在线实时答疑。

3. 保证夜大学在校教学顺利开展，学院各部门通力配合，在寒假期间搭建适合夜大学的在线教学平台，及时对第一次参加在线教学的老师提供培训与帮助，并对教学平台和授课老师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技术支持，确保夜大学在线教学正常开展。

4. 为保证教学质量，学院要求所有任课老师及辅导老师积极提前备课，且需保证授课内容和教学方式要能够满足在线教学的特点和要求，同时做到“标准不降低”，待疫情解除后，可迅速切换为正常教学方式，确保完成本学期教学任务，提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质量。

目前学院网络学历教育已于 2 月 17 日正常开学，包括注册、选课、课件点播、答疑辅导、课程论坛、网络作业等各项教学工作均正常开展。夜大学业余学习将按计划于 3 月 7 日正式开始线上授课，继续教育学院将为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学习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三、服务学生、充分应对。

在疫情期间，继续教育学院坚持为学生提供服务，切实为学生解决困难。学院安排专人通过电话、微信及 QQ 等方式与学生和学习中心保持畅通有效的联络，确保在“延期不停教、延期不停学”的特殊期间，能够做到各项工作及时响应，学生有求必应，第一时间回应学生问题和需求，为学生在学习上提供指导和便利，加强对学生的关心，引导学生做好疫情期间的防护。同时学院



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基础之上，继续为学生提供开具证明、成绩单等服务，解决学生的燃眉之急和实际困难。

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处于一刻不能放松的关键时期，学院做好学历教育“停课不停学”的同时，还将配合整体疫情防控工作，利用网络教育的经验和优势，围绕健康和心理专题、政策应对专题两个系列，通过在线的方式开设9

门非学历培训课程，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将“延期不停教、延期不停学”的工作进行到底，共同打赢战“疫”！

编辑：开水

来源：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微

信公众号



网教之声

社交媒体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挑战与机会

[摘要] 最有意义、对生活影响最大的技术可能是社交媒体，因为它们被融入商业、娱乐和教育活动中并扮演重要角色。一般认为这些工具应用于高等教育正式课程/专业中有诸多好处，本文对此进行概述，讨论其不足和挑战，重点分析这些工具使用上的便利和价值与（用户）失去对数据的控制之间的矛盾。我们很可能会继续看到自己出于公私目的使用社交媒体所产生的数据继续被使用的情况，包括经过授权和未经授权的使用。分析了人们为了应对这个挑战而提出和尝试的一些解决方法，并简要介绍其中两种。第一个方案强调由机构自身创建和管理自己的社交媒体，第二个则是一种新兴技术方案，允许用户控制自己的数据但同时又能在多种社交环境下享受分享和发展的益处。

[关键词] 能供性；挑战；高等教育；

机会；隐私；社交媒体；解决方案；监控。

导读：近年教育领域研究热点之一是社交媒体与教育的融合。“技术尝鲜者”教师、研究者乃至决策者似乎对社交媒体教育用途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即社交媒体对教育有积极促进作用，甚至能创新教育模式和产生颠覆性影响。毋庸讳言，基于这种假设的研究、实践和决策从一开始便有失偏颇，难以产生具有推广应用意义的经验和成果。诚然，社交媒体与教育的融合势不可挡，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即使初衷良好，也不能忽视或低估其消极一面。正如联合国《新技术策略》报告所指出的，技术并非没有风险（risk-free），它们甚至可能被恶意滥用或产生有违初衷的不良后果。^①或许正因如此，“作为长期倡导基于技术开展教育创新的老兵”，本文作者特里·安德森教授对



社交媒体教育用途“喜忧参半”，应邀为英联邦学习共同体《学习促进发展期刊》（Journal of Learning for Development）撰写此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安德森教授为人谦虚，说这是一个退休教授对这个热门话题的一点看法而已。我拜读之后对他的“喜忧参半”很有同感，于是在他的支持下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文章首先根据相关研究成果介绍社交媒体对教育的促进作用，包括协作和合作学习、交互、媒体/数字素养、学习动力、参与机构、社会和政治活动、获得社会资本、注意力管理和自我组织能力、课程学习、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的融合、生成学习、多媒体交流技能、资源搜索和策展、成果传播和合作研究，以及终身学习等方面。此外，社交媒体还可能有助于“促进教师和研究者的专业发展和提升网络素养”。如此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各方共赢的局面。然而，从文章所引用的一项大型研究（ $n=6,139$ ）的成果可以看出，高校教师的社交媒体用途并非主要是为了服务教学（我认为，或许不仅教师如此，学生的社交媒体用途估计主要也不是

为了学习），“也不了解社交媒体与正式教学活动融合的价值和设计”。另一方面，鉴于社交媒体具有新兴性特点，而且种类繁多，用途各异，功能又一直在发展，对社交媒体教育用途的成效和价值难以做出全面评价。当然，社交媒体促进教育教学的潜能不容否定。

文章接着分析社交媒体应用于高等教育的挑战。第一，如同其他大众媒体一样，“社交媒体本身固有的商业性以及其旨在促进广告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商业模式与教育目的格格不入”。事实上，社交媒体的使用不是无偿的。它们会持续向我们推送商品和服务的广告，而我们的使用数据又被它们用于“对我们‘数据化’（datafy）、量化、跟踪、监控和分门别类”，继而进一步向我们推销特定广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未经（我们）同意和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从公民话语权和个人以及机构隐私的角度讲引起我们的关切”。第二，社交媒体的“过滤气泡”想象与教育的宗旨相悖，缺少对育人必不可少的“批判性成分”，即使有时不乏纷争，但激烈甚至是恶语相向的“文斗”同样不足取。第三，大型中心化社



交媒体机构通过算法使得我们只能接触到它们为我们“精准挑选”的信息，从而达到影响我们的行动的目的。第四，数据(隐私)没有得到应有保护。然而，虽然存在各种“隐患”，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更好的商业模式，“我们别无选择”。

那么，社交媒体在正式教育中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何呢？有研究表明，“人们对社交媒体的积极看法和实际使用程度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上面提到的有 6,139 名高校教师参加调查的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都显示实际使用情况不容乐观，“在正式教育中使用社交媒体的障碍似乎不比其潜在优势少”。即使在远程教育机构，这种情况也不见得更加乐观。文章还介绍了虚拟教学倾向量表(Virtual Teaching Dispositions Scale)。

作者在接下来一节表达了对隐私和数据所有权的关切。本节引用哈拉里(Harari)“现代人进化”系列丛书

第三部关于社交媒体数据的论述，即“我们……既是非个人能控制的外部力量进行决策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然而这实则“危及我们自由民主根基”。

接着又引用朱博夫(Zuboff)2019年的新书《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在权力新前沿为人类未来而战斗》涉及“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时代数据的经济价值观点。一言以蔽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上所述，我们实际上是用我们自己的数据换取社交媒体的“免费”服务。

鉴于存在的风险，作者提出必须管理社交媒体在教育中的应用。文章以作者受阿尔伯塔教师协会(Alberta

Teachers' Association)委托对该省 K-12 课堂在线学习情况的调查为例，说明教育“谷歌化”(Googleization)现象已经近乎泛在化，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隐私和我们对自已的活动和思想的控制受到极大威胁”。作者发问：“社交媒体在教学上和提高学习动力上的作用是否如此之高，以至于机构有理由集体对潜在风险置之不理、继续使用这些产品？”

文章接下来简要介绍两种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安德森和同事乔恩·德龙(Jon Dron)开发的一个校内社交媒体平台 Athabasca Landing^①，其最大的特点是“既能保住控制权又能确保数据



用于教育（而非商业或政治）目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Athabasca Landing 尚未被机构或教师所接受。

第二个方案是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文章以万维网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正在负责研发的 Solid 平台为例，其最大特点是“允许用户保留对自己数据控制权”，从而达成“选择、改变和提升自己的学习体验”的目的。当然，作者也承认，不是说因为有机机构自己研发的平台或者去中心化的平台，社交媒体应用于高等教育的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从教育研究的角度看，“太多研究都是属于案例研究和描述性研究，缺乏实证数据，尤其是教学效果的实证

数据。”安德森教授在这方面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第一，大量研究都是经验总结之类的案例和描述性研究，科学性和严谨性不足。第二，研究对象以“教育技术尝鲜者”为主体。换言之，代表性不足。再者，研究者难以获取全面的社交媒体数据，因为这些都是社交媒体机构的“私有财产”。凡此种种，都对研究结果产生消极影响。

读罢这篇文章，我的第一反应是文

章所述的社交媒体与高等教育融合的情况具有普适性，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技术与各级各类教育相融合的情况。本刊“国际论坛”多篇文章涉及这些问题，而我也多次在“导读”中表达了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因此这里不再赘述。我觉得我们在开展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实践与研究之前，必须先弄清楚这种融合的目的是什么。换言之，是技术与教育的关系。诚如贝茨所言，我们“不是反对技术的教育用途，而是主张明智使用技术。”^②技术是工具，服务教育的工具，而不是反之。工具是中性的，技术并非解决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能因“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而跟风，得当使用能产生好的结果，反之则会导致不良后果。因此，在我们决定采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任何（新）技术之前，一定要全面衡量利弊，不能用“浪漫情怀”代替询证决策。

我曾应邀在 2018 年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第十四届年会上做了题为《远程教学创新——来自“蛇梯棋”的启示》的发言，我提出五个坚持的循证创新观：1. 坚持



实事求是的创新观。任何教学创新都有其适用范围,也有自身的局限。“梯子”和“蛇”与创新一路同行,任何失败都不足为奇,因此不能报喜不报忧,研究报告要如实、全面、客观呈现试验结果。

2. 坚持基于系统论的创新观。技术不是灵丹妙药;技术能够发挥辅助作用,但是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把教育“分包”给技术,一了百了。

3. 坚持迭代研究的创新观。一蹴而就的创新难以产生有信度和效度的成效;任何教学创新都必须假以时日才能见成效,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坚持迭代研究,才能不断完善,最终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

4. 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创新观。只有理论没有实践,这与空谈无异;只有实践没有理论,则可能误入歧途或迷失方向,更难以取得有推广应用价值的经验。

5. 坚持循序渐进的创新观。以点带面,循序渐进扩大试验范围,彻底解决规模化和推广性的问题。当然,五个坚持的循证创新观还没有涉及教育教学以外的“潜在风险”,这些恐怕是非教师一己之力所能处理好的问题。总而言之,对于技术的教育用途,我们不能没有浪漫情怀,但也不能小觑潜在风

险,这样才能使现实不再骨感。

衷心感谢安德森教授对本刊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和厚爱!(肖俊洪)

一、引言

教育不是存在于它所处的社会或技术环境之外,因此,社交网络工具的用户和开发者提出教师和学生要了解 and 接触这些工具的新能供性——这一点不足为奇。此外,研究者也已经开始理解和认同非正式社交媒体工具与正式教育融合的学习设计及其好处(Czerkawski, 2016)。社交媒体的教育用途广泛且日益发展,作为长期倡导基于技术开展教育创新的老兵,笔者对此却是喜忧参半。对于任何一种被融合到教育中的工具,我们都必须分析能够证明其成效的证据以及与之相关的挑战和问题。本文拟结合正式教育研究成果以及笔者和其他同行在传统课堂和网络课堂反思性使用社交媒体的经验,阐述社交媒体教育用途的成效、挑战和问题。

二、社交媒体的教育能供性

社交媒体在本文指个人、团队和群组用于消费、生产和分享内容的联网工



具，包括大型平台（如 Facebook、Skype、WhatsApp、微博和微信）以及个人网站和博客网站。

在过去二十年的“社交媒体时代”（social media era），研究者发现社交媒体能够或可能给高等教育带来好处，很多时候他们还提出支持使用社交媒体的理由。研究表明，不管是基于校园还是远程或混合式环境，社交媒体的使用不但会继续下去而且还会持续发展。至少一些初步研究结果显示社交媒体能给教育带来以下主要好处：

- 提供协作和合作学习的机会和支持（Bilandzic & Foth, 2013）；

- 意识到他人的存在和可能与他人交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提供多元文化接触和学习机会（Hu, Gu, Liu, & Huang, 2017）；

- 提升媒体/数字素养，包括培养批判性素养（Pangrazio, 2016）；

- 提高动力（de-Marcos, Garcia-Lopez, & Garcia-Cabot, 2016）；

- 增加机构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非正式参与度（Ranieri, Rosa, & Manca, 2016）；

- 发展学术身份和个人身份，获得

社会资本（Davis III, Deil-Amen, Rios-Aguilar, & GonzálezCanché, 2015）；

- 训练注意力管理和自我组织能力（Kimmerle, Moskaliuk, Oeberst, & Cress, 2015）；

- 通过社交媒体的推送和移动功能促进参与课程学习（Pimmer, Mateescu, & Gröhbiel, 2016）；

- 融合正式和非正式学习（Greenhow & Lewin, 2016）；

- 有可能创建“生成学习社区”（generative learning communities）（Lewis, Pea, & Rosen, 2010）；

- 掌握多媒体交流技能的机会（Brown, Czerniewicz, & Noakes, 2016）；

- 发现、评注和策展资源（Antonio & Tuffley, 2015）；

- 研究成果传播和合作者招募（Khatri, et al., 2015）；

- 支持学校和毕业生之间保持联系，服务终身学习和校友会活动（Carter, 2018）。

当然，好处不仅仅是上面这些，还会继续发展。这些好处成为扩大其教育



用途以及提高教与学成效的证据,而且还说明教师和教育机构都是受益者。

必须指出,社交媒体的作用不只是给正式教育增加“上线”成分。通过学习管理系统给课程增加混合式或在线内容毫无疑问会使其在学习时间和地点上更加灵活。这些活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数字素养。然而,如果融合社交媒体,学习者则“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目标以及所偏好的参与方式、在线社区和社交媒体平台等情况获得个性化学习体验”(Gruzd, Paulin, & Haythornthwaite, 2016),从而增加其潜在价值。

除了能发挥教与学功能外,社交媒体的一些特点有助于积极促进教师和研究者的专业发展并提升网络素养。一项研究调查了社交媒体给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带来的好处,研究者(Moorhead, et al., 2013)发现六个主要好处:①增加相互交流;②更容易获得、分享和量身定制信息;③获取医疗信息更方便、机会更多;④获得同行/社会/情感支持;⑤公共卫生监控;⑥可能影响医疗政策。社交媒体也可能给其他行业带来诸如此类好处,包括教育领域。意大

利开展了一项有趣的研究(n=6, 139),发现高校教师把社交媒体用于私人用途远多于教学用途。这可能说明比起跟同事的“分享”,他们更不愿意与学生“分享”(Manca & Ranieri, 2016b),也不了解社交媒体与正式教学活动融合的价值和设计。尽管如此,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说明接触这种技术的机会很多,相比之下,对于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这一点同样很重要)在正式教育中使用社交媒体,人们了解得却不多。

教育技术倡导者有一句口头禅——“重要的不是你拥有技术,而是你用它干什么”。社交媒体纷至沓来,成为激发大量具有创新意义的教育活动和模式的工具。因为这些是新兴工具,功能不断增加,其种类繁多,用途各异,因此不可能评价社交媒体的总体成效和价值。但是,显而易见,社交媒体源源不断给教师提供开展教学试验的机会,他们可以围绕其原本设计的目的开展,也可以创新用途。教师所选择、设计和实施的学习活动丰富多彩且具有新兴的特点。教师的这些选择反映和支持其机构和学科的语言和文化。比如,科学教师用社交媒体工具设计出来的



活动很可能不同于历史教师的活动。然而，在线学习活动的设计和搭建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也要求教师具备专门技术知识和技能。研究结果往往显示教师的这种知识和技能体现在他们对社交媒体不同用途的设计上（Chen & Bryer, 2012）。

教育领域的复杂技术创新总是与挑战和问题相伴。不是所有创新都能产生短期或长期的好结果。有些技术经过采用之后发现没有成效或甚至是危险的，这种情况并非鲜见。

三、社交媒体应用于高等教育的挑战

如上所述，社交媒体种类繁多，用途各异，要评价其教育用途的总体成效和价值有一定困难。同样，要发现和评估社交媒体应用于教育中的问题也非易事。社交媒体有很多用途，其中有不少引起研究者的担心（Regan, Jesse, & TalatKhwaja, 2018）。

长期以来，对社交媒体持批评态度者怀疑其本身固有的商业性以及其旨在促进广告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商业模式与教育目的格格不入。这种观点也许对社交媒体不公平，因为教育所使用的

大众媒体无一不是主要依靠广告收入，从学术期刊到报纸和电视无一例外。但是，谁都不愿意看到自己和学生的数据记录在未经同意和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此外，我们虽然付出时间（关注这些广告商品和服务），而且我们的数据也被利用了，但相对于这些媒体给我们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代价不算大。

我们使用商业性媒体其实是做交易，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而为之。我们关注它们推销的商品或服务，以此换取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建立社交或教育联系或得到想要的娱乐、新闻或学习机会。有研究者认为，我们在这些平台上的活动产生太字节数据，公司利用这些数据对我们“数据化”（datafy）、量化、跟踪、监控和分门别类，并向我们推销特定广告，骚扰我们（Lin, 2018）。

比如，笔者想弃用 Facebook 和 Twitter，但是又很珍惜 Facebook 群组其他人所分享的见地以及我在 Twitter 上关注的人所分享的资源和观点。如果我是学生，我会喜欢督促我参加学习的通知。换言之，我关注它们推销的商品或服务，以此换取有价值的



东西。至于今后能把我的数据用于什么目的，现在尚不清楚，而这一点从公民话语权和个人以及机构隐私的角度讲引起我们的关切。

有些持批判性态度的人认为社交媒体不宜用于教育目的，因为它追求轻松愉悦、人以群分的倾向十分明显，缺乏诸如不同意见和严肃讨论这些批判性成分。很多社交媒体的应用程序都存在过滤反对意见的现象。换言之，使人们生活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之中（Pariser, 2011）。有人指出，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流会被自动分类，变成有相似政治和社会观点的人士之间的互动（Friesen & Lowe, 2012）。纳格尔（Nagle, 2018）认为：“社交媒体网站本身设计的目的是使人感到轻松愉悦。置身于这样的空间犹如生活在一个没有恶语相向的世界（虽然在这个网络社区以外人们目睹和经历这种恶习），存在把这样的世界当成网络乌托邦的风险。”这些观点既对又错。生活在志趣相投者的过滤气泡中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但是同样不足取的是这些媒体所出现的常常是激烈且有时还是恶语相向的纷争。

大型中心化（centralized）社交媒体公司使用自己的算法为用户精准挑选内容，这样用户就只能接触到某些内容。用户不可能明白这些算法是如何为他们量身定制内容的，更不可能控制这些算法。现在是算法决定推送什么内容给我们，而在此类公司出现之前，我们能接触到大量信息（比如博客、新闻动态、电子邮件等）并从中选择自己的网络临场。现在我们只能是内容的消费者和创建者，但是这些内容却被媒体公司所拥有并用于影响我们自己和其他对相同话题感兴趣人士的购物活动和政治活动。博客作者瑞安·佩尔顿（Ryan Pelton, 2018）指出：“随着每一个新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被遗忘的博客墓地的规模越来越大。”现在不是我们自己挑选新闻，而是算法悄悄地或许可以说心怀叵测地为我们挑选新闻。

很多评论家指出隐私泄露、偷窃和商业上的滥用日渐增多，他们呼吁社交媒体自我整顿或是政府采取有力的新措施加以管理（如：Bullock, 2018）。因特网媒体公司似乎没有尽应有之力保护我们的数据，而是把我们的数据用



于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的目的。诸如不恰当发布（甚至销售）个人和隐私的数据、过度推销商业产品和使用旨在使用户对某种媒体上瘾的那些技术——凡此种种，屡见不鲜。

我们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感到安全和自在，而是因为我们喜欢其提供的有价值的东西或服务。比如，笔者时常有弃用 Facebook 的念头，但是目前我还不知道能够从其他什么途径保持与锤扬琴社区或我所在社区的邻里联合会的联系，与大家互相学习、一起学习。因此，至少在目前，我从社交媒体得到的好处足以抵消他们把我的数据用于商业用途和（或）滥用我的数据所造成的损失或风险。当然，这种商业模式之所以成功，原因是我们别无选择。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贡献便能享受到社交媒体给我带来的好处，而是还有其他人的贡献，我们所有人都受制于这种数据所有权模式。

几年前有一篇社交媒体用途的文献综述（Nadkarni & Hofmann, 2012），作者们的结论是使用和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有两个主要驱动因素，一是归属感

的需要，一是自我表现的需要。然而，近年来社交媒体也发展成为了解本地和国际新闻的一个主要来源和与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保持联系”（及时了解——译注）的渠道。这些都是使用社交媒体的强有力理由，也是社交媒体本身设计的功能所在，其目的是使用户上瘾（Andersson, 2018）。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64）指出，起初我们使用新媒介完成以前用旧媒介进行的任务。还有其他研究者持这种观点。这一点在学习管理系统得到明显体现，这种系统主要用于完成那些传统的任务，如发放内容和作业管理。这种传统的用途几乎没有发挥如前所述技术的潜在教学价值。社交媒体的首要目的是为其投资者赚钱，其次是增进社会互联互通和分享，促进共同兴趣。有趣的是虽然很多学习管理系统提供诸如博客和维基这些协作工具，但却很少被用于教学中（Cantabella, López, Caballero, & Muñoz, 2018）。

有些学生和教师认为社交媒体可用于非正式学习，但是正式学习（虽受到机构的制约，但这样也有其好处）



最好是使用办学机构能更有效监督和控制的媒体。有研究者（Czerkawski, 2016; Greenhow & Lewin, 2016）认为学习不可能被严格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正式环境下的学习常常被融入非正式活动中（一般都如此）。格里诺和勒温（Greenhow & Lewin, 2016）提出这种观点：“学生可能在众多不同环境中参加具有正式、非正式和非正规特点的学习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学习、何时学习和跟谁在一起学习。”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开发能把正式学习活动扩展到更具公共性质的领域中的工具。

四、社交媒体在正式教育中的实际使用情况

社交媒体与高等教育融合有很多潜在优势，教师和学生也经常在非正式教育活动中使用社交媒体，但是，“人们对社交媒体的积极看法和实际使用程度之间存在（巨大）差距”（Keenan, Slater, & Matthan, 2018）。

意大利一项针对大学教师的大规模研究（n= 6, 139）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仍然非常有限且受到限制，教师不太愿意在教学中使用社交媒体设

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上的抵抗、教学上的问题、隐私方面的担忧和机构的限制”（Manca & Ranieri, 2016a）。

英国一项针对医学专业教师的小规模调查（n=67）发现，在教学中使用社交媒体的最大障碍包括教师担心“学生专业素养”、分散学习注意力、改变师生关系和教师缺乏学习有效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Keenan, et al., 2018）。这些研究者还发现，教师几乎不了解社交媒体具有现有在线和由机构控制的媒体所不具备的潜在优势。由此可见，在正式教育中使用社交媒体的障碍似乎不比其潜在优势少。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关于社交媒体教育用途的研究大多数聚焦校园教育。但是针对远程教育教师和学生的特殊用途和需求的研究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长期以来，一提到远程教育人们便联想到“远距离学习者的孤独”。此外，大多数远程教育教师是兼职人员，他们分布在各地，业务上也很可能互不往来，同事之间相互支持的机会较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虽然有障碍，但是社交媒体可能给远程教育机构、学生和教师带



来的好处会促使他们比基于校园的机构在更大程度上使用社交媒体。尽管没有证据证明采用不同教学模式的机构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上各异,但是我本人在一所单轨模式远程教育机构推广社交媒体的使用和帮助教师采用社交媒体方面的经验表明,即使在远程教育大学,使用社交媒体同样遇到很大挑战。

由于社交媒体的使用经常是教师个人选择的行为,因此有可能受到教师对社交媒体用途,尤其是作为教育的一种学习工具的态度影响。有研究者认为某些教学倾向能促成虚拟环境下的良好教学效果并使之持续下去(Welch, Napoleon, Hill, & Rommell, 2014)。所谓倾向,指的是“影响教育工作者态度和行为的那些原则、承诺、价值观和职业道德”(Martins & Ungerer, 2015)。韦尔奇等(Welch, et al., 2014)指出倾向稍微不同于态度或偏好,并认为“一个人的倾向体现在其行为上。用于量化倾向的正是行为”。倾向会因经验和环境而变,因此不同于学习风格或性格,因为它们通常被视为几乎是稳定的。韦尔奇等(Welch, et al., 2014)全面梳理相关文献,采用Q分类方法,制

订了一份包含 25 项内容的虚拟教学倾向量表 (Virtual Teaching Dispositions Scale)。该量表涵盖影响在线教学成败的三种主要倾向:教学临场(涉及教师开展呈现、组织和评估这些常规教学活动的能力和效果)、专家/认知临场(涉及所执教学科的知识 and 能力)和社交临场(志在成为班集体的一员,看得见、积极和关心他人的一员)。对第一阶段在线教师(n=165)研究进行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需要增加第四个成分,即虚拟/技术临场,用于评估教师个人对在线教育环境中使用的工具感兴趣的程度和积极探索使用这些工具的程度。

马丁斯和恩格勒 (Martins & Ungerer, 2015) 使用这份量表调查南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的远程教育教师 (n=314), 发现虚拟/技术临场得分最低, 据此提出专业发展和政策的重点应该是给教师创造机会使用在线工具和培养他们使用这些工具的能力。很多远程教育教师不愿意广泛使用社交媒体, 部分原因是他们缺乏接触这些技术的机会, 社交媒体能支持什么学习活动以及使用社交媒体能



得到什么好处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倾向。此外，有些教师是喜欢跟学生面对面打交道，至少是实时交流，才从事教学工作的，他们在用社交媒体与学生互动时无法体验到面对面打交道的那种关系。

表 1 列举了每一种倾向的指标^①。马丁斯和恩格勒（Martins & Ungerer, 2015）认为一些倾向要比其他倾向更容易改变，但这种观点未经证实，至少他们在文章中没有提出证据。

| 容易改变← | | →难以改变 | |
|---------|-------------|----------|------------|
| 专家/认知临场 | 社交临场 | 教学临场 | 虚拟/技术临场 |
| 对教育的热情 | 分享个人信息和经验 | 守时 | 采用各种各样技术 |
| 对职业的忠诚 | 表达对他人的关心和兴趣 | 开展有意义的考核 | 维持有意义的在线临场 |
| 展示幽默 | 关注个体 | 组织 | 寻找继续改进的机会 |
| | 表达同意 | | |

表 1 虚拟教学倾向量表指标

从上述相关研究结果可知，我认为融合社交媒体的过程非常复杂，但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开展远程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使他们更愿意在教学中有效使用社交媒体。

五、隐私和所有权关切

哈拉里（Harari, 2018）在现代人进化系列丛书第三部中指出来自

社交媒体的数据越来越有价值，还提到使用基于人工智能工具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行动。哈拉里认为算法将比我们自己更加了解影响我们决策的因素（如我们的健康、财富、愿望和局限等方面的决策），他说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临。这些算法越来越复杂，加之数据被聚合到集中式数据库，我们因此既是非个人能控制的外部力量进行决策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这是一个危及我们自由民主根基的挑战。

哈拉里分析为什么这样收集数据越来越重要。这一点似乎与教育工具的“免费使用”尤为相关。他在书中写道：“一款流行的 APP 可能没有采用某一种商业模式，短期内甚至可能会赔钱，但是只要它能吸数据，它就可能数十亿身价。”（Harari, 2018, p. 78）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型网络应用程序（如 Facebook、Twitter、Google、微信等）便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它们向我们免费提供服务，我们则要跟它们分享我们的数据。这种数据可能（实际已经）被用于很多目的，但没有一个目的对于数



据的贡献者和早已习惯拥有自己个人资料的人来讲是透明的。维尔伯

(Verborgh, 2019) 指出, 允许机构或平台在我们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我们的数据——这一点目前正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因为谁也说不准我们的数据将被谁用于何目的。

肖莎娜·朱博夫 (Shoshana Zuboff) 2015 年的一篇文章, 尤其是 2019 年的新书《监控资本主义时代: 在权力新前沿为人类未来而战斗》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的有关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

“注意力经济” (Attention Economy) 时代数据的经济价值。她指出, 被收集起来的这些数据一些被用于改进产品和提高用户体验, 但是大量数据被储存起来以创造“行为剩余” (behavioural surplus)。这种剩余数据被聚合起来分析, 然后卖给想影响我们行为 (尤其是我们的购物、消费和政治决定) 的各种买主。我们很容易对这种数据“偷窃”感到愤怒, 但是可别忘了我们不是被出售

的产品, 我们是原材料。作为加拿大人, 我们很清楚自然资源提炼的情况, 即我们不是很善于保护“我们原材料”的价值。在眼下的注意力经济时代, 我们又在“重蹈覆辙”, 把我们的资源卖给早期的风险投资公司, 以换取微不足道的公共产品回报。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使运算这些数据的算法效率越来越高, 我们越来越习惯享受到的服务, 并且通过继续使用给这些公司贡献更多数据。这种数据 (包括个人数据和机构产生的数据) 与其他数据聚合之后变得更有价值; 个人的决策越来越受到算法的影响, 甚至被算法取代。然而, 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六、管理社交媒体在教育中的应用

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了一系列与社交媒体有关的丑闻, 包括黑客入侵和商业上滥用用户隐私 (Wall, 2018; Yar, 2018)。平心而论, 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利益与公司 (营运者) 自身利益相互冲突时, 我们真能相信这些公司在代表我们 (用户) 的最大利益吗?



2018年我主持一项质性研究，受阿尔伯塔教师协会（Alberta Teachers' Association）委托调查在线学习在K-12课堂的开展情况

（Anderson & McPherson, 2018）。研究结果不出意料，很多勇于创新的教师把这些工具融合到各种各样的课堂、远程和混合式教育环境中。但是最令我吃惊的是阿尔伯塔课堂的“谷歌化”（Googleization）。Google Chromebooks、Google Classroom、Google analytics、各种Google实用工具和Google的教师发展研讨会，凡此种种，近乎泛在化，阿尔伯塔超过90%的校区都在使用这些东西。为何会如此“泛滥”？原因是这些工具可靠、功能多，最重要的是由Google免费提供。

那么，Google为什么要这样做？从一个层面上讲，教师和源源不断的学生成为Google云服务的熟练用户，而仅这一点便可能给Google创造一种利润丰厚的商业模式。但是，可能更加有吸引力的是学生产生的数据。虽然如同其他主要供应商一样，Google承诺不会把收

集自K-12学校的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见《学生隐私保证》（The Student Privacy Pledge）

（<https://studentprivacypledge.org/privacy-pledge/>），但是对于如何使用来自高等教育的个人信息，不管是经过授权还是未经授权的使用，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或控制。

我们知道使用社交媒体可能有很多好处，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隐私和我们对自己的活动和思想的控制受到极大威胁。显然，使用这些商业产品（尤其考虑到它们令人怀疑的商业道德操守）并不是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传统上使用的学习产品或环境。那么，社交媒体在教学上和提高学习动力上的作用是否如此之高，以至于机构有理由集体对潜在风险置之不理、继续使用这些产品？

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难道社交媒体对高等教育机构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们心甘情愿放弃对自身数据和师生数据的控制权？是否有其他办法？下文简要介绍两种可能的方案：第一种是使用机构自己的社交媒体服务，既能保住控制权又能确保数据用于教



育（而非商业或政治）目的；第二种则更加能够代表未来的发展，即研发允许用户保留对自己数据控制权的工具，以用于选择、改变和提升自己的学习体验。

七、机构拥有的社交媒体

2012年，笔者和乔恩·德龙（Jon Dron）开发了一个校内社交媒体平台——在开源 ELGG 环境下运行的 Athabasca Landing。我们曾在另文详细介绍过这个平台（Anderson & Dron, 2017; Dron & Anderson, 2014）。简而言之，Athabasca Landing 具备各种社交和实用工具，包括博客、微博、创建和支持小组和群组的工具、策展、推荐、点赞以及各种交流工具。这个系统显而易见的好处是能够使数据不会被用于商业或政治利益。然而，虽然“功能齐全”，但是它竞争不过诸如 Facebook 和 Google 这些机构雇佣的程序员和用户界面设计师这些精兵强将。虽然 Athabasca Landing 目前还在使用，但是它尚未得到机构支持，没有成为机构教学平台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许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课程和专

业的教师或教学设计者没有采用我们自己的平台。虽然 Athabasca Landing 能保证数据安全又具备社交网络功能，但是这些似乎不足以使它在吸引足够学生或教师成为其用户上优于学校使用的学习管理系统。如同其他社交媒体一样，Athabasca Landing 只有被使用才能发挥作用，而只有它能发挥作用才会被采用。

在教育领域，学习数据跟其他个人和机构数据结合在一起时会更有用，能创设学习情景，指导个性化学习场景和计划的设计（这是学习分析的“圣杯”！）。但是，Athabasca Landing 没有获准与外部个人数据源链接在一起，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因此对它的能力要求简单，同时也限制了它的能力。由于面临教师和机构不愿意使用，加之建设和维护自己开发的平台困难重重，Athabasca Landing 现在只能被当成一项精品科研成果，而不是机构、教师和（最重要的是）学生觉得是具有竞争力的改进版社交媒体。

八、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人们提出几个解决隐私和所有权

问题的方案，其中之一是万维网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 2018）提出的。他目前正在负责 Solid 这个平台的开发，目的是使个人能控制和拥有数据。数据归个人所有之后，仍然能够被用于其他目的和与其他数据聚合，但是此时用户（数据生成者）保留数据控

制权，用户有权决定多少应用程序使用或销售这些数据或跟多少应用程序交易。维尔伯（Verborgh, 2019）指出，在这种模式下数据由个人所有，储存在个人的 POD（Personal Online Data，个人在线数据）上，因此不同于现有模式（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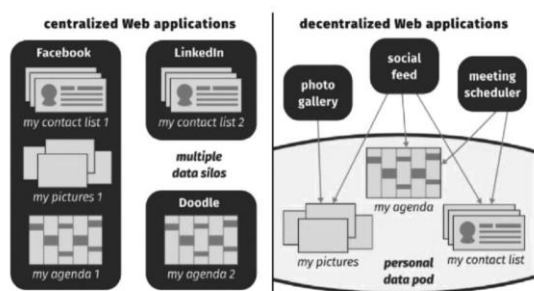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 Web 服务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模式 (Verborgh, 2019)

必须指出，上文介绍的两种方案远非能够解决社交媒体应用于高等教育中所碰到的种种挑战。哈拉里（Harari,

2018）说，在土地所有权和买卖方面，我们有数千年经验，在公司的所有权和买卖方面也有数百年经验，至于数据的所有权和买卖，我们只是近几年才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但是，我们难道因此而愿意用学校生成的数据（包括个人和集体数据）换取免费使用的时髦应用程序吗？

九、社交媒体研究的问题和机会

如上所述，社交媒体的使用尚存在很多不为人所了解的问题，我们希望正式教育领域如何开展这方面研究呢？我们用批判性目光分析社交媒体的研究文献，发现一些令人遗憾且颇令人沮丧的结果。太多研究都属于案例研究和描述性研究，缺乏实证数据，尤其是教学效果的实证数据。格里诺和阿斯卡利（Greenhow & Askari, 2017）对过去十年社交媒体在 K-12 教育中的应用进行系统回顾，发现“最普遍的研究是围绕一般用途的研究，而最不常见的研究则是技术在促进学生学习方面的效果”。围绕“一般用途”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开始使用的新工具，但是不足以证明成本效益或学习成效。

在我担任《国际远程开放学习研究评



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期刊主编十年期间,我一直深感失望,因为很多稿件(通常被退稿)可以说是属于“这是我的经验做法,效果很棒,不是吗?”这一类的文章。之所以缺乏基于证据的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式教育系统很多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存在这些情况。十多年前,我比较加拿大用于健康领域研究的拨款(其目标是 3%拨款用于研究)和教育研究拨款(0.1%拨款用于教育研究)。由此可见,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似乎都对教育研究的好处和成本回报缺乏信心。我还注意到太多研究的样本是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尤其是教育技术研究生。我们真的能以为教育技术的“尝鲜者”可以代表全体学生或教师吗?最后,如上所述,学生和教师使用社交媒体产生的数据归社交媒体公司所拥有(而且捂得严严实实)。研究者要检查和分析这些数据却受到限制或未能获得许可。只有这些公司才能分析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总是不对外公布,经常用于获取商业优势和促进对外销售的目的。

虽然存在拨款少、数据难以获得和缺

少广泛的方便抽样,但是研究工具本身(主要指社交网络分析工具和自动化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的能力持续发展,我们必将能够继续了解到哪怕是极其有限的开放获取研究结果。我对这一点充满希望。

十、结束语

我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阐述社交媒体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机会以及在近期和远期的可能发展。教育能够监控和改进自己实践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教师能以新方式与学生保持联系,同等重要的是,教师能以新手段监控和干预学生学习,提高教与学的效能。学生则能用新方法寻找、检索和分享他们的学习产品和机会。然而,这些好处的代价是失去隐私和控制。持续的监控、研究和对监控者的监督对教育质量和机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Anderson, T., & Dron, J. (2017). Integrating learning management and social networking systems. *It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5(3). Retrieved from



<http://ijet.itd.cnr.it/article/view/950>

Anderson, T., & McPherson, D. (2018). Online learning initiatives. In Alberta schools. Edmonton: Alberta Teachers' Associ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eachers.ab.ca/SiteCollectionDocuments/ATA/Publications/Research/C00R-101-19 OnlineLearning Initiatives.pdf>

Andersson, H. (2018). Social media apps are 'deliberately' addictive to users. BBC.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44640959>

Antonio, A. B., & Tuffley, D. (2015). Promot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digital curation. *M/C Journal*, 18(4). Retrieved from <http://journal.media-culture.org.au/index.php/mcjournal/article/view/987>

Berners-Lee, T. (2018). One

small step for the Web....

Medium. Retrieved from https://medium.com/@timberners_lee/one-small-step-for-the-web-87f92217d085

Bilandzic, M., & Foth, M. (2013). Libraries as coworking spaces: Understanding user motivations and perceived barriers to social learning. *Library Hi Tech*, 31(2), 254-273.

Brown, C., Czerniewicz, L., & Noakes, T. (2016). Online content creation: Looking at students' social media practices through a connected learning lens.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41(1), 140-159.

Bullock, L. (2018). The biggest social media fails of 2018. *Forb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orbes.com/sites/lilachbullock/2018/11/27/biggest-social-media-fails-2018/#4e4c3bc5518f>



- Cantabella, M., López, B., Caballero, A., & Muñoz, A. (2018).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lecturers' activity in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erceptions.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6(7), 911-923.
- Carter, W. (2018). Media marketing strategies university leaders use to increase alumni financial support. Walden University.
- Chen, B., & Bryer, T. (2012). Investigating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for using social media in 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13(1), 87-104.
- Czerkawski, B. (2016). Blending 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networks for online lea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17(3), 138-156.
- Davis III, C. H., Deil-Amen, R., Rios-Aguilar, C., & González Canché, M. S. (2015). Social media, higher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colleges: A research synthesi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two-year institutions. *Community College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39(5), 409-422.
- de-Marcos, L., Garcia-Lopez, E., & Garcia-Cabot, A. (2016).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ame-like and social approaches in learning: Comparing educational gaming, gamification & social networking. *Computers & Education*, 95, 99-113.
- Dron, J., & Anderson, T. (2014). *Teaching crowds: Learning and social media*. Edmonton, Canada: Athabasca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upress.ca/index.php/books/120235>



Friesen, N., & Lowe, S. (2012). The questionable promise of social media for education: Connective learning and the commercial imperative.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8(3), 183-194.

Greenhow, C., & Askari, E. (2017).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th social network sites: A decade of research in K-12 related education.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2(2), 623-645.

Greenhow, C., & Lewin, C. (2016). Social media and education: Reconceptualizing the boundarie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41(1), 6-30.

Gruzd, A., Paulin, D., & Haythornthwaite, C. (2016). Analyzing social media and learning through content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facete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Learning Analytics, 3(3), 46-71.

Harari, Y. N. (2018).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Toronto: Random House.

Hu, S., Gu, J., Liu, H., & Huang, Q. (2017).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media usage i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 30(2), 265-281.

Keenan, I. D., Slater, J. D., & Matthan, J. (2018). *Social media: Insights for medical education from instructor perceptions and usage*. MedEdPublish, 7.

Khatri, C., et al (2015). Social media and internet driven study recruitment: Evaluating a new model for promoting collaborator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PloS One*, 10(3),



e0118899.

Kimmerle, J., Moskaliuk, J., Oeberst, A., & Cress, U. (2015). Learning and collec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with social media: A process-oriented perspective.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50(2), 120-137.

Lewis, S., Pea, R., & Rosen, J. (2010). Beyond participation to co-creation of meaning: Mobile social media in generative learning communiti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49(3), 351-369.

Lin, Y.-W. (2018). # Delete Facebook is still feeding the beast - but there are ways to overcome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s://dspace.stir.ac.uk/bitstream/1893/26880/1/Lin-Conversation-2018.pdf>

Manca, S., & Ranieri, M. (2016a). Facebook and the others. Potentials and obstacles of

social media for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omputers & Education*, 95, 216-230.

Manca, S., & Ranieri, M. (2016b). "Yes for sharing, no for teaching!": Social Media in academic practices. *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29, 63-74.

Martins, N., & Ungerer, L. M. (2015). Virtual teaching dispositions at a South African open distance learning universit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71, 929-936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Toronto: McGraw-Hill.

Moorhead, S. A., Hazlett, D. E., Harrison, L., Carroll, J. K., Irwin, A., & Hoving, C. (2013). A new dimension of health car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uses,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of social media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15(4), e85.

Nadkarni, A., & Hofmann, S. G. (2012). Why do people use Facebook?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3), 243-249.

Nagle, J. (2018). Twitter, cyber-violence, and the need for a critical social media literacy in teacher educa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76, 86-94.

Pangrazio, L. (2016). Reconceptualising critical digital literacy.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37(2), 163-174.

Pariser, E. (2011).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Penguin Group.

Pelton, R. (2018). Say no to the algorithm gods. Medium. Retrieved from [https://medium.com/@ryanjpelton/say-no-to-the-algorithm-gods-](https://medium.com/@ryanjpelton/say-no-to-the-algorithm-gods-747b5a8cebd0)

747b5a8cebd0

Pimmer, C., Mateescu, M., & Grö hbiel, U. (2016). Mobile and ubiquitous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setting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3, 490-501.

Ranieri, M., Rosa, A., & Manca, S. (2016).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media for participation, content creation and e-engagement. Students perspectives and empowerment. In E. Brown, A. Krastiva & M. Ranieri (Eds.), E-learning and social media: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 for the digital 21st century (pp. 223-248). Charlotte, NC USA: IAP.

Regan, P., Jesse, J., & TalatKhwaja, E. (2018). Big data in education: Developing policy or ethical implementation in the US and Canada. Ottawa: eQuality Project. Retrieved from <http://www.equalityproject.ca/wp->



content/uploads/2017/05/9-Big-Data-in-Education-Developing-Policy-for-Ethical-Implementation-in-the-US-and-Canada.pdf

Verborgh, R. (2019). Re-centralizing the Web, for good this time. In O. Seneviratne & J. Hendler (Eds.), Linking the world's information: Tim Berners-Lee's invention of the World Wide Web. ACM. Retrieved from <https://ruben.verborgh.org/articles/redecentralizing-the-web/>

Wall, D. S. (2018). How big data feeds big crime. *Current History*, 117(795), 29-34.

Welch, A. G., Napoleon, L., Hill, B., & Rommell, E. (2014). Virtual Teaching Dispositions Scale (VTDS): A multi-dimensional instrument to assess teaching dispositions in virtual classrooms. *Journal of Online Learning and Teaching*, 10(3),

446.

Yar, M. (2018). A failure to regulate? The demands and dilemmas of tackling illegal content and behaviour on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ybersecurity Intelligence & Cybercrime*, 1(1), 5-20.

Zuboff, S. (2015).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0(1), 75-89.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作者简介: 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 博士, 加拿大阿萨斯卡大学(Athabasca University) (加拿大开放大学) 远程教育中心荣休教授, Contact North/Contact Nord 机构研究顾问。曾任加拿大远程教育研究所



(Canadian Institute for Distance Education Research) 所长和加拿大远程教育首席科研教授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Distance Education)，曾担任《国际远程开放学习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期刊主编长达十年之久。安德森教授 2015 年 8 月正式荣誉退休。

译者简介：肖俊洪，汕头广播电视

大学教授，Distance Education (Taylor & Francis) 期刊副主编，Syste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Elsevier) 期刊编委)

责任编辑：韩世梅

作者：特里·安德森 (Terry Anderson) 译者：肖俊洪

文章来源：中国知网，原文刊

自《中国远程教育》，2020 年 02 期



■ 北大人物

严仁英：投身预防保健 助力生命绽放

编者按：北大有着“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两弹一星”到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成功提取青蒿素到联合研制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北大科技工作者在科学技术领域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科研进展和科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稀土分离理论及其应用、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后来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制等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持续引领时代进步、造福人民造福世界。当前北大正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北大新闻网特开设《初心·使命》专栏，讲述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的故事，以激励北大师生弘扬科学报国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时代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人物简介：严仁英（1913.11.26-2017.4.16），出生于天津，1940年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1951年12月加入九三学社，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北大医院名誉院长，北大“蔡元培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曾任九三学社中央第六至八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三、五、六、七、八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

2008年严仁英95岁寿辰，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曾赞誉她是“中华知识分子典范，我国围产保健之母”。在一个世纪的人生路上，严仁英用她的一片

医者仁心，守护了我国千万母婴的平安与健康，帮助更多生命粲然绽放。她见证了北大医院的成立、见证了共和国的成立、见证并实现了共和国围产医学的成立。



严仁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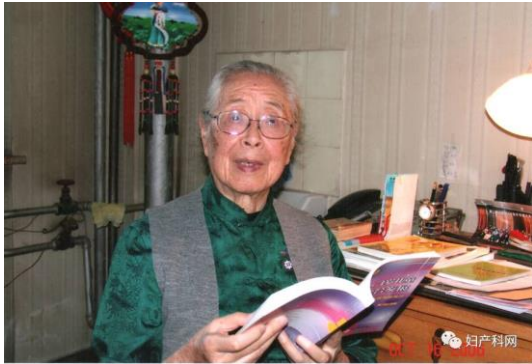
从懵懂少女到正式求医

严仁英出生于民国初年，6岁丧父，随寡母和兄弟姐妹们生活在大家庭中。其祖父严修是我国近代教育先驱，南开大学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的伯乐与恩师。由于祖父在家中办有幼儿园和小学，严仁英未出家门就完成了早期教育。她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受到了良好的启蒙

教育，后来在南开女中也是品学兼优、乐群活泼，善与他人合作。

严仁英在回忆读书生活时曾说：“在南开学习得轻松活泼，没费什么劲儿，从来没有死啃书，就能牢固掌握，这都得益于优秀的老师……南开教育我一辈子都热爱群体，与同志们打成一片，能与别人团结合作，这样我才能干成许多事情。”

家里没有人搞医，严仁英想学医的初衷是希望能给家里人看病。后来听从母亲建议，她去清华读了生物。老师们知道严仁英想学医，允许她选修协和医预科的必修课程。1935年，严仁英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拿到了奖学金。经过5年“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学习，1940年夏，严仁英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她始终以过人的天赋，迈着轻松的步伐，追逐她的梦想。后来，她被介绍到由我国妇幼事业先驱杨崇瑞创办的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工作和学习，从此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全新领域渐渐走进严仁英的视野，她开启了妇幼保健之路。



严仁英

严仁英有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伉俪情深，共同奋斗，夫妻二人被称为“杏林双彦”。王光超（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是严仁英的大学同班同学，他在实习时的一次急诊经历给严仁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2年，二人喜结连理，婚后，严仁英辞去工作和丈夫在家开业。在北平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刻，夫妻二人将私人诊所作为革命根据地药品输送站，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送医疗物资。

艰难探索：围产保健之母

在严仁英看来，妇产科是“一个人进、两个人出”的甜蜜事业，同时也是苦涩的幸福。毕业后，她选择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任住院医师，师从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林大夫说她会定期来查房，手术也会带着我做，还说只要有困难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不分昼

夜……”林教授是她心中的楷模恩师，我国历史上第一本妇产科杂志《中华妇产科杂志》也在她们的共同付出下正式创刊。

20世纪70年代，严仁英在北大医院开设外阴门诊，开创了国内妇产科门诊领域的先河。在那个计划生育全靠人工手术流产的年代，严仁英积极探索药流，进行非手术终止妊娠的研究，她是我国药物流产技术最初的先行者，并率先在妇产科增设了“早孕门诊”，造福广大女性。1979年，严仁英当选北大医院院长。上任后，她将自己的事业从临床转入预防保健，特别向农村妇女保健方面转移，为降低我国围产妇女死亡率闯出一条路子。严仁英说：“50年代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期间，我就开始意识到，在未感觉有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对于那些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宫颈癌患者，我们则一筹莫展，那副惨状，真令人痛心。”严仁英是医学模式转变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她革了临床医学的命。

同时期，严仁英赴美访问，亲自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回国后创建了北大医院妇产科“优生保健



组”。而后完成了三件大事：“挂牌子”“搞培训”“出本书”。严仁英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决定仍倍感欣慰，因为“临床医学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保健则可以造福一群人”。围产保健也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日益茁壮。

上世纪 80 年代，七旬高龄的严仁英明确自己尚有三大心愿要完成，要为中国幼儿保健事业办三件事：在北大医院建成一座妇儿大楼；建立全国围产医学会；创办全国性围产医学杂志。在她的大力推广下，围产保健技术应用于全国。我国围产儿的死亡率也由 1988 年的 15.13%，降低到 1997 年的 10.93%，大约每隔 3 年下降 10%。严仁英愿望的实现，是我国围产医学向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围产医学和围产保健工作很快在我国城市和农村蓬勃发展起来。

“急脾气”的医生

身边的人评价严仁英：她是一个“急脾气”，急到走出医院主动给人家“看病”，急到亲自深入群众中调查“来不及”看病的患者。她生活简朴却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她为奔赴“非典”一线的医务人员捐款购买降温设备，又

慷慨解囊为地震灾区的重建献出自己的一份心意。直到她 90 多岁高龄时，只要身体允许，每周仍坚持上两个半天的班。正是这样一位“爱着急”的女子，扛起了我国妇幼保健和围产医学的大旗，撑起了我国妇幼保健的一片天。

1948 年，在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一年。留学深造时，严仁英看清了资本主义“自由”表象下的虚伪嘴脸。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严仁英回国，回国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给妓女查体。严仁英本想把这项工作当作行善，可结果却很受教育：“自己最初对妓女的印象是片面的，她们之中很多人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以才走上这条路的。”她的真诚感动了妓女教养院的学员，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位儒雅、气质脱俗又有些雷厉风行的女医生。

即使身处逆境，严仁英也坦然面对。“文化大革命”中，严仁英被撤销一切行政职务，于是年逾半百一心为社会主义祖国医疗事业做贡献的“严主任”被贬为清洁卫生员“老严”，负责清洁厕所。当时的严仁英正患甲亢，人又黑又瘦，同事们开玩笑地叫她“甘地”，有

不少病人就是在厕所里向这位“圣雄”求医的。1979年，德高望重的严仁英全票当选为北大医院的院长，她对所有当年曾经造过自己反的人既往不咎，令全院敬佩。这是北大人的气度，是大家风范，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佳体现。

面对神圣使命，严仁英勇于担当，访问西北，甘愿为祖国和人民奉献；抗美援朝，揭露细菌战罪行；作为新中国妇女代表多次出席国际会议，是外交榜样，是我国妇女的优秀“样板儿”。



严仁英

1965年，在毛主席“医药卫生工作重点应该面向农村”的指示下，严仁英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开始了为期两年

的下乡办学：一边办学习班，一边治疗妇女病。那段经历，让她亲身体会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妇女们遇到非意愿妊娠时所面临的危险和采取的冒险行为；为产妇接生，土剪子是唯一的工具，有点知识的还先烧一烧，所以产妇的死亡率特别高；那时的农村连最基本的预防注射都没有。

1990年，严仁英带头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通过大量的人群研究证实了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剂量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通过3年普及、两年提高的步骤使中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了50%。

卓越贡献：桃李天下，薪火相传

在半个多世纪为中国医学拼搏奉献的工作中，严仁英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知名教育医学家，深受同学们爱戴。严仁英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在北京远郊密云县培养的“半农半医”学生，大都成了当地的医疗骨干，这么做，是为了更需要医生的地方。她创立了妇幼卫生系，并亲自主持修订妇幼卫生专业“妇女保健学”和“儿童保健学”教学



大纲，不断创新，硕果累累，成就了今日北大医院的围产医学。她当了 25 年的全国人大代表，8 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带头发出器官捐献倡议，提倡试行安乐死和母婴保健法等提案。

作为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主任，她与日本培养温暖心灵总部携手开展“教与爱”活动，并多次在国际人口会议上介绍我国少生、优生的国策，在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充满激情地介绍中国妇幼保健事业的成就。

常有人问严仁英长寿秘诀，她答道：“能吃能睡，没心没肺。”所谓没心没肺，就是心胸宽大，不计较名利得失，对人友善，能宽容，能合作，就寝时就能心情平定安然入睡。

“在绵延了一个甲子的人生沧桑和命运变幻中，这位老人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曾用她光明照亮了多少

人的生命道路，曾用她的炽热温暖了多少母亲、儿童和家庭。”严仁英的学生段得琬如此缅怀她的恩师。严仁英始终情系围产，胸怀妇幼，用一双大手为千万生命建起了爱的港湾。

参考资料：

《慈母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的百年记忆》，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1）

《生命，意味着工作每一天——记“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10.4.5）

《严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健康报》（2019.10.22）

文字：校报记者 门艳晨

编辑：山石

责编：白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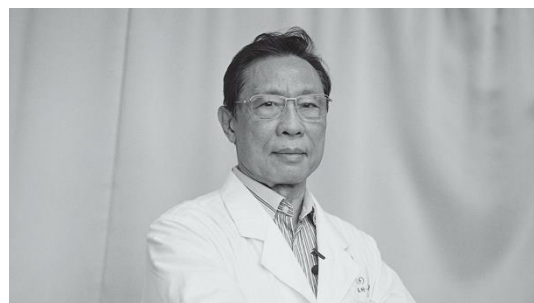
信息来源：新闻中心

医者钟南山

编者按：北大有着“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两弹一星”到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成功提取青蒿素到联合研制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北大科技工作者在科学技术领域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科研进展和科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稀土分离理论及其应用、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后来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制等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持续引领时代进步、造福人民造福世界。当前北大正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北大新闻网特开设《初心·使命》专栏，讲述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的故事，以激励北大师生弘扬科学报国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时代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个人简介：钟南山，1936年10月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

大学医学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抗击“非典”中，他不顾生命危险救治危重病人，奔赴疫区指导医疗救治工作，主持制定我国“非典”等急性传染病诊治指南，为战胜“非典”疫情作出重要贡献。主动向公众普及卫生知识，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为夺取应对甲型流感、H7N9禽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改革先锋、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白求恩奖章。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钟南山



每周四下午是钟南山的例行问诊时间，如无特殊情况，他会两点半准时出现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三楼1号诊室，问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

他们通过专家热线预约，提交病例后由钟南山的助手们筛选，紧急的病症有可能优先安排。每周只有十几人能坐在钟南山面前，获得和钟南山一对一的至少半小时。现在病人平均要等三到六个月。名声最盛时，约他看病的人甚至排到两年后。

门诊被钟南山视为“必要的事情”，同样必要的事情是周三上午的查房，他的学生、护士、护士长、主治医生、主任医师紧随其后。查房所看病人有限，有病人会边哭边拉住他。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教授张挪富回忆，1992年刚到医院时，大查房就已经开始了，至今未曾间断过。“他主要是看一些诊断和治疗有困难的疑难病人，解决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

钟南山自认是“临床医学家”，门诊发现的疑难病症，他会当作学术研究的挑战，回到实验室攻关。在他心中，

疑难病症是课题。“实践医学就是一边实践，一边科研，不能只是搞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病人的问题。”

他已经82岁，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从未停下，已经很多年没休息过了。“我有周六和周日，但我要干活。”

67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是钟南山人生众多转折点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2003年，“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来袭，在疾病最先爆发的广东，作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呼吸科的代表人物，原本只在行业内享有盛名的钟南山被推到了台前。



2003年2月16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英东广州重症监护医学中心，钟南山（右）与其他专家在医治一位非典病人图/纪粤鸣

在这次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疫情危机中，当疫情一度被瞒报、人心惶惶时，拥有准确的信息、有依据的治疗



措施,主张无隐瞒披露的钟南山迅速成了抗击非典的“领头人”,他的每一句发言都能占据媒体醒目的版面,他的一举一动成了非典疫情的风向标。他被贴上“敢说真话”的标签,同时也成了非典时期医疗工作者的最佳代表。有关他的传记《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排在非典时期畅销书前列。

对于钟南山所展示的形象,媒体多用“斗士”或“战士”来描述,《人民日报》形容他拥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拯救生命于死神的博爱精神”。

非典之后,钟南山头衔与声名齐飞,先后当选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中华医师学会会长等等。“敢说真话”的性格让他成为媒体追逐的热门人选,参加两会时一段被记者长枪短炮封锁的50米路段,他要走半小时,对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否专业,他都会说点什么。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钟南山说”。他对公共事件的发声延续了非典时期的风格。他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问:“现在药品名称这么多,我临床45年,有的药我都叫不出名字,这么多新

药是怎么出来的?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往往是一个药品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立刻飙升。这些批号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也在论坛上批评广州的空气污染:“无论是有病还是没病,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灰霾与肺癌有极大的关系。”他每一次发言,几乎都会引发广泛讨论。2011年至2012年,他多次呼吁检测公布PM2.5数值。2013年1月,环保部公布全国各城市PM2.5数值,而非按原计划到2015年在重点地区进行防控。

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大变化。每周三周四,查房问诊雷打不动。下午下班后快走或跑步20到25分钟,双杠、仰卧起坐、单杠,一套流程下来大约一小时,每周三到四次。十年前的一次心脏手术让他告别了篮球场,“现在不太能做对抗性的运动”。球队并未忘记他,82岁生日那天,送了他一件所有队员签名的球服,上面写着“福如东海,寿比钟南山”。

这些年,他一直忙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防治工作,大力推动肺癌筛查居

民健康服务,建成广东呼吸中心依然是他最大的追求。

遭遇非典

2002年12月2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以下简称“呼研所”)收治了一位从广东河源转来的危重肺炎病人。由于呼研所一直研究呼吸类疾病,一开始没那么紧张。该病人一直发烧不退,病情渐渐恶化,给他做机械通气,只能小容量通气,做多了肺会破。当周周三钟南山查房时,第一次接触到这位病人。之后他得知,收治该病人两天后,河源救治该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钟南山警觉到这是一例值得关注的特殊病例。



广医一院抗击非典全院动员大会 图/受访者提供

广东省内接连出现相同病例,截至2003年1月20日,中山发现28例此类病人。21日钟南山赶到中山,会同广

东省卫生厅专家组,对病人进行会诊和抢救。22日,专家们起草了《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首次将这一怪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2003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根据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点,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并提出了酌情使用皮质激素等治疗原则和可能通过空气飞沫传播的传播方式及通风换气等一系列预防措施。随后钟南山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程东海对媒体回忆,钟南山根据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感染,在大年二十九(那年没有年三十)晚上,连夜组建隔离病房,取消一线人员休假,同时采购物资。投建3天的呼吸危重症监护中心建制投入,将优质资源全部投入了非典防治工作。

1月中旬到2月中旬,用于控制非典的物资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段。非典研究不足,珠三角一带病人越来越多,第一批收治的医院,大批医护人员也被感染,病情渐渐控制不住。钟南山急于弄清疾病来源,联络了香港大学的管轶和



郑伯健教授，取下病人身上病毒样本，交给他们到香港检测，并签订协议：一方发现病原体，须共同协商，征得国家卫生部同意才能发布。

钟南山从上海开会回来，一下飞机就被专车接到广东迎宾馆开会。有消息称管轶会在第二天公布非典病原很可能是禽流感。为了解情况，钟南山凌晨3点赶去香港，与管轶确认后，将他和郑带回广州解释情况。

38小时未合眼的钟南山发烧了，左上肺有肺炎，全身乏力，但据他对非典患者症状及体征的大量观察体会，他认为自己不是非典。为不影响士气，他选择在家治疗，由于没地方挂吊瓶，他在走廊门框上钉了一根钉子，至今没拔掉。5天后，肺部阴影消失。休息了3天，他回到医院。当时除了家人和一名打点滴的护士，没人知道钟南山病了。

2月11日，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钟南山受命对媒体讲解非典的发生和病人的发病情况。他以院士声誉担保，称“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

很长一段时间内，钟南山和攻关小组全力以赴钻研疾病的救治方法。他与

肖正伦、陈荣昌等专家研究出了“无创通气”（与通常插管或切开气管通气不同，采用无创鼻部面罩通气），增加了病人的氧气吸入量。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类固醇或皮质激素。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

在医学界，用类固醇治疗病毒性感染是大忌，对病人使用皮质激素，也与传统治疗肺炎的方法相反。

钟南山将以上措施写入《广东省医院救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3月9日下发各地市与省直、部属医疗单位。3月是广东非典最严酷时段，六家专门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已不堪重负。3月17日，广东省全省累计报告病例首次突破1000例。钟南山此时说出了至今仍被人们记住的话：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郑伯健回忆，钟南山那时要求把广东最重的非典病人都送到他那儿，“重症患者都是要把气管切开的，很危险。但后来的结果是，他那里重病号的死亡率得到了控制”。他的措施得到了证明，双管齐下，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达到87%。

说出真相

疫情初期，钟南山压力颇大。2月18日，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专家向社会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权威媒体的报道使他的结论被认为得到了官方认可。

广东医疗界人士并不认同这一结论。钟南山对每一个携带非典病毒的病人进行了检查，他让病人忍住不咳嗽，观察每个病人的口腔，发现这些病人的咽喉部没有症状，如果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伴有上呼吸道炎症。而且临床证明，大量使用应对衣原体的抗生素对非典病人均无效果。广东省决策层采纳了他的意见，坚持和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



2003年，广州，非典病原研究发布会
图 / 受访者提供

4月11日下午，呼研所拟在次日下午举行发布会，宣布非典病原和一个月前香港专家发现的一样，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12日，广东媒体刊载了这一消息。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的病原体。钟南山的坚持再一次被印证。

2003年4月12日，北京召开了一场为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中外记者举办的发布会，钟南山被要求参加。会前，有关部门让他“不要讲太多”，关于病人的情况，可以说有的医院做了转移。第一天的发布会他按照要求做了。第二天，在记者的追问下，面对“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提问，钟南山忍不住大声说出：“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现场哗然。



“我老有一种感觉，好像专门喜欢跟谁较劲，老觉得不管走到哪儿，自己都不太受欢迎。”

钟南山坚持认为，信息公开是疫情防治的重中之重。在一次采访中，他称：“政府对疫情发展实情的信息发布越是透明，公众就越是稳定，诚实永远是上策。”发布会之前的清明节，他循例祭拜父亲，正值疫情没有得到控制但权威声音说“已经得到控制”之时。思考良久，他决定说出真相。

发布会后，4月20日，国家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由于防治“非典”不力被免职。这一天被外界称为“改写中国抗击非典的里程碑”。



2003年非典时期，钟南山与日本卫生部门人员在一起 图 / 受访者提供

4月26日，在央视播出的《面对面》中，钟南山对主持人王志“你关心政治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广为流传，

他几乎脱口而出：“我只想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一个人在他的岗位上能够做到最好，这就是他的最大政治。”

同年4月，他被时任总理温家宝点名一同参加“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型性肺炎问题特别会议”。那年，钟南山去了16个国家和地区，以一线医学研究者的身份讲解中国如何应对非典。程东海回忆：“他非常忙，很疲惫，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主动到国外演讲。国外的人都知道他在呼吸疾病领域是中国的权威，他实事求是把中国情况告诉国外专家和媒体，讲述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采取了什么措施，取得了什么成效。这种做法得到很多国外学者的认可。当时很多国家都把中国封闭起来了，广交会也不派人来了，他的行为为政府缓解了很大的压力。既消除了国际社会的误解，又证明了真正的重要性。”

首届全运会 400 米栏冠军

如果不是非典，钟南山此前的67年岁月，几乎可以用默默无闻来形容。

钟南山1936年10月20日生于南京，医院地处钟山以南，父亲钟世藩为



他取名“南山”。钟世藩是孤儿，9岁被带到上海做仆人，后来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成为40位入学者中最后成功毕业的8名学生之一，是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治医师，解放后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一级教授，是中国著名儿科专家。母亲毕业于协和高级护理专业，曾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父亲自费买来小白鼠在书房做实验，家里的三楼都是老鼠，钟南山的医学启蒙由此开始。他每天都去喂小白鼠。有人来找他父亲，问邻居住址，邻居说：“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道大，就是他们家。”

钟南山儿时经常在医院里，耳闻目睹父亲和别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那时候晚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他家看病，孩子康复以后，家长非常高兴，父亲也很开心。“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感受就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的满足感，这是当时的一个热爱的原因。”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大三那年，由于体育成绩突出，钟南山作为运动生代表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获得400米跑第一名。1959年9月，他在首届全运会上获得400米冠军，并以54.4秒打破全国纪录。之后，他拒绝了北京体委的邀请，留校从事放射医学教学。次年，他获得北京市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亚军。



年轻时的钟南山 图/受访者提供



钟南山（后排右三）与广医篮球队友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1964—1966年，钟南山被派往山东乳山搞“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开始后，钟南山家庭受到严重影响，母亲因不堪大字报羞辱，在被红卫兵揪斗、批判后自杀。1968年，钟南山被学校革委会安排去烧锅炉。一次上级号召献血，他献出400毫升，昏倒在炉门口。次年，他参加下乡医疗队，来到河北宽城县，遇到病人却束手无策，作为医学院毕业生，他很自责。1971年，钟南山在妻子李少芬帮助下，通过部队调令离开北京，到广州第四人民医院（后改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一名医生。

“我上大学时做师资，从事新专业，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一直都服从分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所能选择的。挑到了这个医院还是因为我爱人的身份，这也是她挑定的，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用不着整天下乡。”这时，他已经快36岁了。

到医院不久，他将一位咳出黑红色血的病人误诊为结核病，次日发现是消化道呕血，病人险些丢了性命。这件事刺激了钟南山，他开始付出从未有过的努力，跟着大夫余真学习怎么处理病人，为什么要这么处理，要做什么检查。晚上回家继续研究功课。余真后来回忆：不过两三个月，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原先圆头满腮、双目炯炯发光、笑口常开的一个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面容严肃，走路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褂，竟然显得飘逸宽松。外人甚至向她打探钟南山是否健康出了问题。8个月后其他医生评价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



在澳大利亚考察时给袋鼠喂食 图/受访者提供

此时，医院“革委会”来要人去做慢性支气管炎的群防群治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我国慢性支气管炎



发病情况，周恩来总理向医务界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这一群防治。全国各地把这事当作医疗卫生问题来抓，更把它当作政治问题来抓，掀起了开展慢支炎防治与研究的高潮。

“革委会”下令，在四医院成立慢支炎防治小组。钟南山因“没有专业、也没有专长”被指派，另两个成员是组长侯恕和大夫余真。在1974年和1975年，小组在《中华医学》和《中华内科》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填补了广州地区多年来没有论文在国家一级医学刊物发表的空白。

打倒“四人帮”后，广东省卫生厅决定大力支持慢支炎气管炎防治小组成立研究所，专门拨了10万元作为所里的科研经费。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作为广东代表，钟南山参加了盛会。他与侯恕副教授合写的论文《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他也因此获得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的机会。

他花了3个多月时间，每天深夜整理白天实验取得的数据，最终以中医理论使英国同行信服。皇家医院呼吸系副

主任瑟特罗教授说：“看来中国对呼吸衰竭疾病真有点研究呀！”

在英伦，他对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研究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项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上发表。回国前，英国爱丁堡大学极力挽留他在皇家医院工作，被他拒绝。

1981年11月18日，钟南山从伦敦飞回祖国，一直在呼研所工作，1996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早诊早治，我们这种战略能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

在英国留学时，钟南山的研究方向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弗兰里教授计算血红蛋白接力曲线变化对组织利用氧气的影响时，钟南山拿自己做实验，吸入一氧化碳使血液碳氧血红蛋白达22%，相当于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连抽六七十支香烟。借助这次实验的数据，他证明导师的推算只有一半正确。

从1999年开始，钟南山带领团队提出对慢性阻塞性肺病进行早期干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中国是人群死因前三位的一种疾病，是钟南山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非典之后，除去对公共事件发言，钟南山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专业科研上。十多年过去，终于和研究小组第一次从流行病学证实生物燃料可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病，第一次发现两种含硫氢基的老药用于预防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安全有效。

针对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治疗，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依然只针对有症状的人。钟南山研究发现，当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就医时，这些病人的肺功能已经损害 50%以上，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我们发现早期控制血压、早期控制血糖就能够预防重症，但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直到现在，全世界的医疗手段还是非常落后的，发现症状才治。我们经过十年的努力，现在全国都增进了早期的干预。”



2018年8月2日，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诊室内查看X光片

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研究，很少人愿意做。这需要医生到社区将病人筛查出来，但因患者早期没有症状或极少症状，病人可能觉得没必要。“如果医者不做，这部分病人就成为‘没人管的孩子’。”钟南山和冉丕鑫与团队一同到广州市区，到连平、翁源等各乡镇社区发现病人。在对40周岁以上，有长期吸烟、职业粉尘暴露等危险因素接触，或咳嗽、咳痰等人员进行细致筛查后，最终为研究提供了841例个案。

“实验证明，早期少量的一些行动就会使肺功能有巨大的改善，有一些恢复到正常，所以我们开辟了一条路，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治疗战略应该和其他病症一样，早诊早治，我们的研究在去年发表了，我相信我们再做一些工作，我们这种战略能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

2017年9月7日，钟南山、冉丕鑫有关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论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噻托



溴铵的一组患者和使用安慰剂的一组患者相比，肺功能改善率明显提升，从一般的 50-60ML 提高至 120-170ML。成果引发全球呼吸疾病领域的轰动，这被他视为非典后最满意的一件事情。

此前，钟南山及其团队相关成果被写进世卫组织编撰的新版慢性阻塞性肺病全球防治指南，其中两篇论文分别被评为《柳叶刀》2008 年度最佳论文和 2014 年度国际环境与流行病学研究领域最佳论文。

2017 年，有感于肺癌患病率的增加，他开始推广肺癌筛查的居民健康服务。由于工作繁忙，这一实践只能在空余时间去做。82 岁的他，又有多少时间是空余的呢？就在采访当日，他要做的事情就有与区领导见面、与呼和浩特市市长见面、问诊……

有时，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老了。非典后，他的身体一直出现状况：2004 年得了心肌梗塞，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 年出现心房纤颤，逼得他告别篮球场；2008 年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 10 斤；2009 年又做了鼻窦手术……

但面前的钟南山头发依然乌黑，说话中气十足。他提起已经说过多次的三个追求：“第一个就是促进呼吸中心全方位建成，现在非常艰难，一定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想办法搞成；第二个，我已经研究了 26 年的抗癌药，我希望把它搞成，现在已经走过了大半路程；第三个，我希望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早诊早治形成一个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一个治疗思想。”

与呼和浩特市市长约定的时间到了。他看了看表，起身，健步如飞，消失在走廊尽头。

感谢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在采访中提供大力帮助，实习记者李艾霖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资料：《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钟南山传》《钟南山——永远的青春之歌》《知识分子钟南山》《钟南山 敢说真话不孤独》《钟南山：广东人的“肺”，中国人的胆》《非典十年：誉病缠身的钟南山》

文字：记者 张明萌

编辑：凌薇

责编：白杨

信息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学者谈读书

张翎：文学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作家张翎（受访者供图）

作家张翎的中篇小说精选集——“生命力”三部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因为在我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在大动荡大起伏的年代里，靠着坚韧的力量活下去的女性角色。所以，出版社把它称为‘生命力’三部曲。”张翎这样解释新书名字的由来。

“生命力”三部曲由《余震》《胭脂》《死着》三本书构成，其中《胭脂》为其最新创作的小说集，《余震》是作者同名小说热销近十年之后的首次再版，《死着》则是对当下题材崭新、细致而大胆的尝试。

作为常年旅居国外的华文作家，张翎第一次引发公众的集体关注，还要追溯到2010年电影《唐山大地震》上映时。《唐山大地震》是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片。在此之前，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儿时就想成为作家的梦想，张翎一直坚持在做听力康复师的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她的小说也曾多次获得文学奖项。然而，最终让更多人知道她却还是因为《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

影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更为广泛的艺术形式，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有时候是通过影视改编才让更多人知晓。关于文学与影视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张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文学是一切文创产品的源头，无论是话剧、音乐剧或是影视剧集，它的根都是在文学创作上。出版社依然对纯文学的作家感兴趣，依然关注原创作者，



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一个道理：文学是不会死的。“阅读市场萎缩，纸质书的市场越来越小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现象，这也是因为现在可供人们娱乐的东西越来越多。尽管文学的受众可能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都没有影视作品火热，但是我觉得，文学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张翎说。

回忆起《余震》的创作过程，张翎说这其实是一次飞机延误促成的美丽意外。在机场候机时，她看到一本有关唐山大地震亲历者记的书，其中的一些故事和小孩的回忆，给了她灵感，促使她提笔写下了这个故事。虽说灵感来了挡也挡不住，但张翎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偶然灵感最后都会成为成品。在调研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可能就慢慢失去了兴趣。总体来说，写作是一件耗费时间耗费心力的事情，能否专注下去也是成功的关键所在。而一个作家是需要想象力的，因为“一个人写作的技巧可以学习，想象力却没有办法学习。”

多年的听力康复师工作让她接触过许多上过战场的退役老兵。尽管听过许多悲伤的故事，张翎却依然可以从容写作，并没有将太多的悲伤情绪带入自己的生活。张翎说：“我会常常用医学的角度来看待写作。一个医生如果把太多的个人同情心带到医学判断里面，他就无法成为一个好医生。我觉得作家也一样，创作的这一部分跟你的个人生活要有适当的切割。”

在张翎的众多作品中，“战争”和“灾难”一直是她钟爱的主题，确切地说，她更喜欢探究人在绝境中的韧性和力量。“在小说中，我塑造了许多坚韧的女性形象。虽然生活的本质是严酷的，是冷的，但是它中间又有很多温暖的点。我特别同意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张翎说。

（记者 刘佳佳）

责任编辑：杨学静

来源：新华网

朱永新：朗读者，读出时代心声



朱永新（资料图片）

前不久，我参加了《朗读者》的新书读者分享会，深感“朗读者”这个词，无论作为一档电视节目还是作为一本图书，都已超出本身的意义，具有了特别的力量。电视、书籍这两种不同的媒体，通过阅读、通过朗读者联系起来，将现代传媒与心灵需求结合，是一件应该点赞的事情。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电视的出现，让许多人在夜晚远离了书桌、疏远了书籍。那时我就呼吁，电视应该把黄金时段留给阅读，应该通过电视把那些最伟大的思想、最美好的诗篇、最优秀的著作介绍给成长中的孩子，给

最需要精神营养的青少年，给需要过精神生活的成年人。在《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电视栏目中，我看见了的这个梦想在慢慢变成现实。

许渊冲先生在《朗读者》一书的序言里说，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发现美、创造美，这个乐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美的乐趣来自阅读这些名篇佳作。是的，阅读不仅让人享受美，也是人之所以为文明人的一个根本。人，是这个地球上唯一能够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智慧，唯一能够通过阅读充盈自己的心灵、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生物。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也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7年前我发起的新教育实验，就把阅读作为教育的抓手，把营造书香校园作为学校的基石，把建设书香中国作为新教育人的使命。这些年来，我们先后编制了中国幼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和教师、父母、公务员、企业家的书目，



我们的新教育实验学校把晨诵、午读、暮省作为师生的生活方式。去年9月28日，我们召开了中国首届领读者大会，将喜爱阅读的同行者请至现场，共同交流探讨。

领读者，就是阅读推广人，就是愿意带领大家一起阅读的人。如果说，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领读则是在创造着幸福；如果说，读者是一个美好的身份，领读者则是传播美好的人；如果说，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领读则是双重的快乐；如果说，读者是一个美丽的称呼，领读者则拥有双份的美丽。朗读者，其实也是领读者，而且是借助了现代媒体的力量，用智慧的方式更为有效地传播，从而说出时代心声的人。通过《朗读者》，很多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领读者，这也是领读者的骄傲。

现在，阅读面临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除了电视这个大屏以外，我们还同时面临着另外两个屏幕的冲击——手机的小屏幕和电脑的中屏幕。当网络时代信息汹涌而来，“低头族”越来越多，阅读日渐碎片化。如何回归真正的阅读，让浮躁的心灵有安顿的地方，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课题。

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成为领读者，用更多方法、在更多平台，创作出更多像《朗读者》这样的节目和作品，让人领略阅读的快乐、发现书籍的美好，一起为建设书香中国而努力。（作者朱永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

责任编辑：李雪芹

来源：人民日报



■ 好文共赏

国家疫情治理史上的北大往事 | 北大新青年

编者按：开篇自诞生之日起以来，北京大学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期如此，灾难面前也是如此。百廿年来，无数北大人薪火相传前赴后继地投入到国家疫情治理中。

今日，北大新青年选择了历史长河中的五个节点，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时刻，与你一起重温中华民族疫情治理的点滴时刻。这些缩影，记录了北大的光荣往事和北大人永恒的家国情怀。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凭借其耐心、意志、勇气和智慧，能够战胜阻碍其前进的一切挑战。

“国士无双”伍连德

1910年10月末，行将就木的清王朝进入最后一个冬天，一场百年不遇的鼠疫从西伯利亚肆虐而至。这场鼠疫在四个月内波及中国五省六市，死亡人数高达六万余人，王朝末日之颓丧更加深了鼠疫之惨烈，彼时的东北已是人间炼狱。

由于当时东北已在日、俄两国势力范围内。日俄两国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由，要求派军主持当地防疫事宜。关键时刻，华人第一位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挺身而出，历史的使命就这样压到了这位刚过而立青年人身上。作为医学博士的伍连德很清楚鼠疫的凶险，但他更明白若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黑死病下的欧洲。出于国土主权的危机感和医者的职业道德，他必须迎难而上。

青年伍连德率领由医生、军警、杂工组成的“二流队伍”，在今人无从想象的艰难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医学才能和领导艺术，一方面与日俄斡旋，另一方面采取了富有成效的系列措施：加强检疫、隔离疫区、控制交通、灭杀病源、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隔离医院收治患者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国家科学防疫行动，当年的经验几经改进绵延至今，依然出现在现代中国疫情治理的诸多场

景中。



伍连德（前排左三）与抗击瘟疫组成员

（图片来源网络）

肆虐欧洲四个世纪的鼠疫在伍连德到达东北 67 天后就被控制并扑灭了。鼠疫过后，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建设了第一家自己的现代化医院——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935 年，因在鼠疫的流行病学研究和预防控制上的巨大贡献，伍连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



民国时期的北京中央医院

1918 年 1 月 27 日医院正式营业这

天，站在萧瑟寒风里的伍连德也许未曾预料，这座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医院连同他本人一起，就此成为北京大学百年来参与国家防疫事业的开端，被历史所铭记。

敢叫日月换新天

鼠疫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再度席卷而来。1949 年 10 月末，爆发于察北的鼠疫已威胁到北京安全。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时任北大医学院院长的胡传揆带头在医学界进行响应，附属医院 60 名医生和 170 名护士加入防疫队；医学院 20 名医师和 75 名护士成为封锁检疫人员（来源：人民日报 1949 年 11 月 05 日）。在政权初建与资源短缺的双重约束中，北大医学人与首都人民奋战 40 余天直至抗疫胜利结束。

这场战斗使 23 岁的学生党员顾方舟坚定了献身公共卫生事业的决心。两年后，他公派留学苏联。彼时，一位 21 岁的宁波姑娘考入北大医学院，她的导师楼之岑在一个月前刚受邀到药学系就职，未来的海淀学院路上因此又多了一位工程院院士。

建国不久，国家开始治理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慢性传染病。1954 年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研究控制麻风病和梅



毒等性病，所长人选正是那位行动果决的北医院长胡传揆。在主持北医繁重工作的同时，他夜以继日参与制定全国防治麻风病规划，其团队相继提出“积极控制，防止传染”防治原则，制定“查、收、治、管、研”综合性防治措施，在全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麻风病防治体制。到本世纪初，中国麻风病治理已取得历史性胜利。



刘少奇与胡传揆（右）亲切交流（图片来源网络）

1954年，当胡传揆开始研究麻风病时，甘肃学生魏承毓从医疗系毕业并在几年后受命研究霍乱防控，最终帮助国家实现对霍乱的有效治理；彼时上海人陈育德刚刚考入北医卫生专业，在此后的人生中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次年，顾方舟学成归国，多地暴发“脊髓灰质炎”，这种病在国内俗称“小儿麻痹症”。顾方舟团队受命研究该病，仅用

四年就研制出活疫苗。为了检验其对人体有无副作用，这位在出国留学欢送宴上敢向周总理主动敬酒的年轻人竟然自己喝下疫苗溶液。为了验证疫苗对儿童的效果，他不满一岁的儿子顾烈东成为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1960年疫苗开始推广，无数儿童因此免于致残，“糖丸”成为几代人的儿时回忆。2019年初，自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顾方舟逝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他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2000年，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在报告上签下名字（图片来源：新浪新闻）

顾方舟归国的同年，那位来自宁波的姑娘顺利毕业，随后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运动中由楼之岑教授指导完成半边莲和银柴胡的生药学研究。“屠呦呦”这个名字，第一次公开出现在中国医学界。1969年，她接到代号“523”的紧急任务，进行抗疟药物研制。三年后，其团队在青蒿

中提取到被命名为“青蒿素”的结晶体，后来又合成双氢青蒿素，这项发明被认为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毕业 60 年后，这位曾罹患肺结核又顽强存活下来的姑娘，因“青蒿素”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华儿女与中国女性的骄傲。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与老师楼之岑一起研究中药（图片来源：新华社）

建国以来，鼠疫、霍乱、麻风病、疟疾等在中国历史上流行已久的传染病相继得到控制，甚至被根除。代代北大医学人延续着历史使命，凭借家国情怀和专业学识，与他们的中国同胞们一道，让中国传染病防治状况在短短几十年内“日月换新天”。

英雄壮志义填膺

1955 年，当顾方舟和屠呦呦走上工

作岗位时。一名来自医学世家的南方小伙考入北京医学院（编者注：1952 年北京大学医学院独立为北京医学院，后屡经变迁，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启了传奇的医学生涯。比起师兄师姐来说，他的高光时刻姗姗来迟。

2002 年末，一种诡异的怪病打破了新千年的岁月静好，这就是后来令人谈之色变的“非典（SARS）”。疫情首先在广东暴发，彼时，当年那个破了全国男子 400 米栏记录的南方小伙已是年近古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叫钟南山，在广州直面“非典”。通过研究，他代表团队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的真正原因。公开资料显示，这份声明的背后受到了当时个别持不同观点的政府部门和学界专家的巨大压力。在父亲坟前沉思良久的钟南山最终选择了“坚持说真话”，为疫情防控争取到宝贵时间。经此一役，无数中国人记住了这个名字，并将这份信任延续至今。



2003年2月，钟南山（右）在医治非典病人

随着疫情扩散，北京沦为重灾区。1918年伍连德建立的北京中央医院已变迁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综合三甲医院。但由于当时没有传染病房，传染源难以阻断，医护人员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即使在这样艰难条件下，这座“模范的平民医院”（创始人伍连德多年前的期望）也没有拒诊任何患者，全院员工义无反顾地战斗至院内污染严重而被迫整体隔离。短短20天内，全院93名员工被感染，丁秀兰医生、王晶护士不幸牺牲，永远安睡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灵堂。

“非典”结束后，根据统计，包括人民医院在内，北京大学附属六家医院约2000名员工在非典期间扛起了首都近1/3救治任务。其中，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这三家综合医院，就诊治确诊“非典”病人549例（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



同事悼念丁秀兰、王晶（图片来源：新华社）

医院之外的第二战场还有大批北大人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较量。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曹卫华、詹思延等青年教师火速赶赴北京各区县担任指挥工作；陈育德、魏承毓等老专家则再度出山组成了二线专家组，针对一线遇到的问题提供指导，有效控制了“非典”在北京的蔓延。基础医学院成为科研攻关主战场，药学院积极开展药物研究，第六医院牵头启动我国第一个大型灾后心理保健服务项目，基因试剂盒等成果纷纷涌现。职责所在，万死不辞，在这场交织着光荣与痛苦的“非典”战役中，北大人从未退却。

重洋万里赴戎机

2003年，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悼念

因“非典”殉职的急诊科丁秀兰医生、王晶护士时，人群中的呼吸科曹宝平医生第一次对英雄主义有了切身之感。几年后，他转入英雄同事的科室继续工作，并在11年后的2014年远赴重洋，代表北京大学参与国家援助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是一种致死率远超“非典”的烈性传染病，其在2014年的爆发对全球卫生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中国政府积极开展援非抗击埃博拉行动。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北大人以派出医疗援助、进行专项科研等形式，积极投身到这项国际救援事业中。

作为第三批中国赴几内亚抗击埃博拉专家组成员，曹宝平深入临床一线参与会诊救治病人。此外，他还与中国驻几内亚医疗队一同编写了《几内亚疟疾防控知识问答手册（中文版）》，协助医疗队充实更新原《几内亚华人埃博拉防控手册》。



曹宝平等与当地医院同行交流

曹宝平的北大同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主任么改琦早于他一个月出发。她参加当地医疗队门急诊值班，对驻地医疗队开展埃博拉感染控制培训以及常见传染病培训，针对当地华商、中资企业开展埃博拉防控的健康教育培训等，在WHO例会上很好地展现了中国医生的风采。



么改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例会

除此以外，北大人对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的贡献还体现在幕后科研工作者的医学研究上。北京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周德敏、张礼和团队发现了三萜天然产物广谱抑制流感、埃博拉和HIV等病毒感染的共性作用靶点和机制。病毒的相关研究成果入选2017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并发表在期刊Science Advances上。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北京大学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事业

中所作的贡献，正是中国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新时代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迎战新冠启新程

2020年春节前夕，武汉正式宣布“封城”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如此规模的防疫行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防疫战中的关键人物，仍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校友钟南山。今年，他已84岁高龄。

1月20日，钟南山“肯定（新冠肺炎）人传人”的采访瞬间传遍大江南北，人们对疫情的态度陡然警惕起来。与此同时，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已在默默集结医护力量。1月26日，随着国家一声令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三家综合性附属医院共60名医护人员第一批驰援武汉。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2月1日，北大再度派出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带队，由12名医管人员组成的第二批医疗队支援武汉。此后又在2月6日、2月7日各派出一支援鄂医疗队。至2月25日，北京大学共派出四批453名医护管理人员“逆行湖北”，人

数占北京援助湖北医疗队的一半以上。



首批参与支援武汉的北京大学医疗队伍

公共卫生战场，王洪源、庞元捷两位教师以及11名研究生志愿者支援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数据统计和分析工作，昼夜不歇地持续奋战在分析全国疫情工作一线。17年前抗击非典时还是青年教师的詹思延、曹卫华等人现在已是北大公卫的中坚力量，与他们的同事一起做了大量疫情分析研判、城市防疫指导、科普知识宣传等工作。



凌晨3点，师生志愿者在中国CDC现场工作

此外，还有很多科研团队正在积极开



展针对疫情的科学研究。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袁晓如研究员领导的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实验室通过网络在全国各地分工协作完成了多个疫情数据的可视化工作。基础医学院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林志强/吕丹/游富平课题组致力于合成一种治疗新冠肺炎的广谱抗病毒纳米药物,目前正在开展相关工作。

与抗击非典时相比,北大人在这次疫情中动员覆盖更加广泛,响应程度更加热烈,参与纵深更加延展。丁倩、柳凌华等北大学生联合其它高校学生发起“高原鹅——高校学生援鄂行动”,通过网络平台筹集资金与物资支援湖北,276所高校的876名学生参与其中。余金焱、黄雨佳、熊梦瑶等一批青年学生在家乡主动报名,志愿奋战在抗疫基层战线。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北夫人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役中再次踏上参与国家防疫的新征程。

1927年12月20日,杭州举行北大建校29周年纪念会,马寅初作“北大之精神”的讲演:“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私利,勇敢直前,以述其至高之鹄的。”这

是北夫人的灵魂初心,也是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根本所在:为有牺牲多壮志,越是艰险越向前。

谨以此文:

**祝防疫战场上的所有英雄平安归来
祝承受着伤痛的亿万同胞抖落尘埃
祝心念恒所系的万里山河重焕光彩**

参考资料:

- 1、吴勇:伍连德与中国鼠疫防治,中国日报网专栏2019年11月15日
- 2、艾智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防疫网络与社会动员——以1949年北京市应对察北鼠疫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3期
- 3、胡传揆:为国人健康效力,北京大学新闻网2019年11月4日
- 4、“糖丸之父”顾方舟: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新华网2019年01月07日
- 5、祝贺北京大学校友屠呦呦获2015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北京大学新闻网2015年10月05日
- 6、医者钟南山,《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37期
- 7、非典十年记忆,《北京大学校报》2013年第1322期
- 8、我院曹宝平副主任医师深入几内亚临



床一线工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官网 2014 年 11 月 15 日

9、我院危重医学科么改琦归来完成援非开展埃博拉病毒病救治任务，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官网 2014 年 10 月 12 日

10、北大 3 项成果入选 2017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北京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02 月 28 日

11、427 人超强阵容！北大医学先后派出四批援鄂医疗队阻击疫情，北京大学新闻网 2020 年 02 月 07 日

12、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战“疫”纪事，澎

湃新闻 2020 年 02 月 14 日

13、科研攻关助力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澎湃新闻 2020 年 02 月 09 日

文字：文彦博 于璞 郭然 杨翊帆

张开 度银泽 许凝

编辑：麦洛

责编：凌薇

文章来源：北大新青年

史苑钩沉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历史沿革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是中国政府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国立医学校。



北京大学医学部西门

- 1903
- 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实业馆，教授中西医学。1904年，医学实业馆改称医学馆，迁入北京和平门外八角琉璃井由兴胜寺庙宇改建的馆舍，1907年停办。1910年，此馆舍被施医总局（当时的卫生部门）买去，为日后创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提供了条件。

- 1912
-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9月，中华民国教育部电召汤尔和到京，筹划创立医学校事宜。教育部以价银10000两购买了已经停办的医学馆馆舍，划拨给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使用。10月16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命汤尔和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并于10月26日颁发校章。至此，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正式诞生。

- 1915
- 2月，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诊察所正式开业，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前身。
- 1923
- 9月，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奉命改建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并首次将学制设为六年制。
- 1927
- 北京所有国立高等学校合并成立国立京师大学校，北京医科大学校更



名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医科。同年，学校附设的诊察所扩充为学校附属医院。

- 1931

- 建立我国医学校中第一个法医教研室。

- 1937

-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西迁，部分医学院师生一同西迁。留在北平的医学院院务完全停顿，1938年1月，当时的教育部将原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合并办起“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为下设的六个学院之一。5月复课，并接收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师生继续学院的教学。

- 1945

- 抗战结束后，北京各公立大学被统一编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北平大学医学院被编为“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六分班”。

- 1946

- 7月，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六分班连同附属医院一同并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先后为解剖学教授马文昭先生、生理学教授沈寓琪先生和皮肤科学教授胡传揆先生。胡传揆教授同时任医学院附属医院（亦称北大医院）院长。

从此，学校作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开始了新的历程。

- 1952

-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并更名为北京医学院，院长为胡传揆教授。直属中央卫生部领导，办学经费由中央财政部分转中央卫生部拨付。北医校址迁至今日的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8号，由此，医学院开始了较大的发展。

- 1954

- 北京医学院作为唯一一所医科学校被指定为六所全国性重点大学之一。

- 1959

- 北医被确定为全国十六所重点院校之一。

- 1984

- 北京医学院作为唯一一所医科学校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一。院长为医学教育专家马旭研究员。

- 1985

- 学校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运动医学专家曲绵域教授任校长。



北医秋景

- 1996
 - 北京医科大学正式通过了国家首批“211工程”建设项目的论证，再次成为中国政府重点支持的医科大学。从1991年至2000年4月，校长为血液病学专家王德炳教授。
- 2000
 - 4月3日，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正式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5月4日，北京医科大学正式更名为北京

大学医学部，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教授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兼首任医学部主任。2003年，柯杨教授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

- 2012
 - 北医建立100周年。2016年4月，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教授接替韩启德教授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



责编：曾玉芬

来源：北京大学医学部官网

■ 大美北大

四月底的北大，将繁花似锦……

北大校友钟南山院士日前表示有信心

在4月底基本控制住疫情

彼时的燕园

正是鲜花烂漫、春色满园

此时战疫仍在继续

征途尚在眼前

送你一片燕园里的繁花盛开

让我们一起

期待不久的将来

期待与最美的燕园相见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势头已得到初步遏

制

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然而

最终的胜利尚未到来

暂别商场热闹

远离景区人海

婉拒好友聚会

勤洗手，戴口罩

云上课，勤锻炼

保护自己和他人

守得云开见月明

待到

春日姗姗而来

冰消雪融

游鱼曳尾跃出水面

新芽初绽

未名湖旁杨柳依依

虽隔千万里

仍心系燕园

期待驰向北京的列车

等候真正的春暖花开

风中传来思念的呢喃

呼唤着北大人

愿你平安健康

无论何时归来

都不算晚……





燕园网讯

现代远程教育校园文化讯息摘编







燕园网讯

现代远程教育校园文化讯息摘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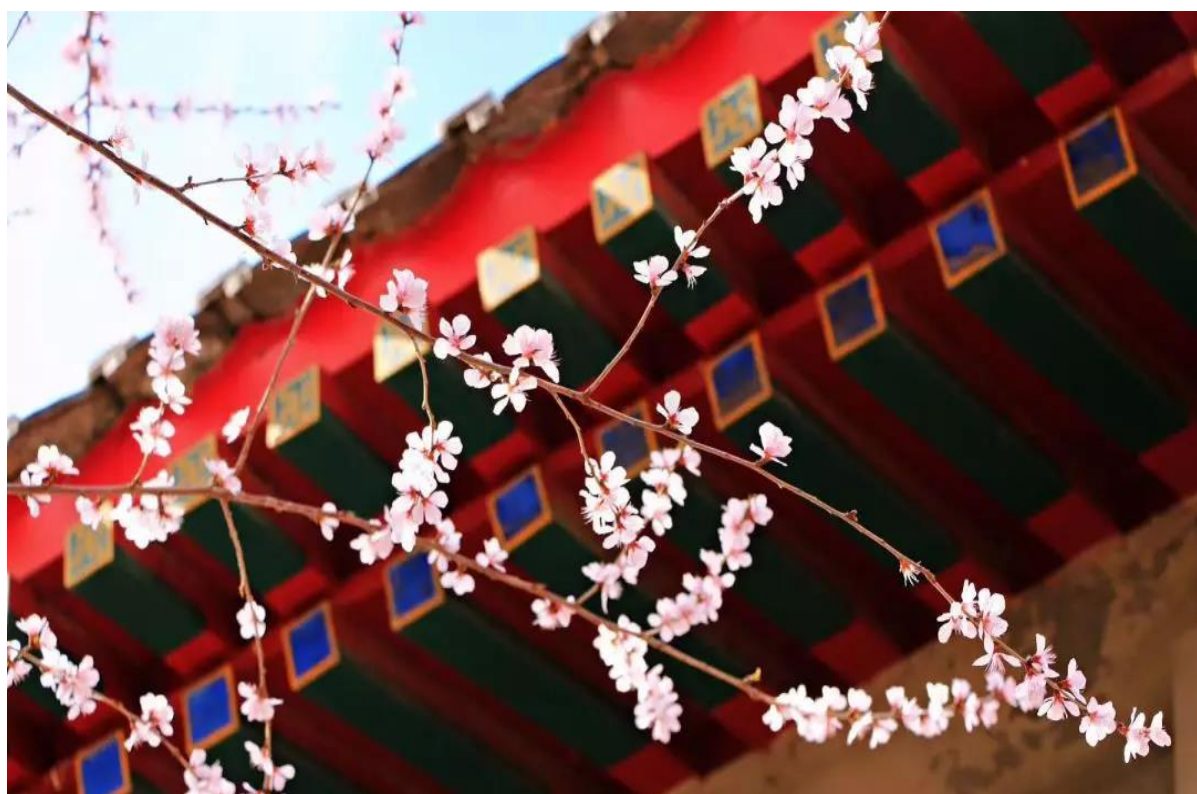


燕园网讯

现代远程教育校园文化讯息摘编



燕园网讯
现代远程教育校园文化讯息摘编





文字：黄熙

摄影：蔡翔宇、谢昊、闵萌、张柳欣、陈敬哲、刘旭都、陈敏、司思、孔玥

峤、郭晓璇、杨雨菁

责任编辑：曾玉芬

来源：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学员心声

共克时艰 守护家园

——在社区抗疫一线的网教学生

编者按：距离疫情爆发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在武汉之外，北京的社区一线的防控更是重中之重，在守护这些“城市细胞”的社区工作者中，我们看到了北大网教学生的身影，他们在党旗之下，树立成一道阻击病魔的有力城防。

尹波，2019 届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工作于北京市西城区金诚信恒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在本次防疫一线下沉服务于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街道，下文来自于社区一线对他的采写。他表示：尽管（自己）无法同去武汉的北大医院的英雄们相比，但有机会为抗击疫情出力也就不枉做北大的学生、北大人。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通行证，测一下体温。”

“你不认识我呀，我就是这个小区的，不用通行证。”

“请您配合，出入小区必须持有通

行证。”

“你这个人怎么……”

在马连道中里社区的执勤点前，运营中心系统下沉社区的党员尹波正在耐心的检查出入小区人员，面对个别不配合的居民和随口而出的风凉话，他依旧微笑着去劝导。在旷日持久的疫情攻坚战下，大家情绪变得有些急躁，个别居民对疫情的形势认知不足，在面对工作人员的检查时，时有言语顶撞和闯岗的事件发生。“我们在这一站就是一天，为大家看好大门，保障社区的稳定和大家的生命安全，有时面对这样的情形，感觉挺委屈的。但看到首都平稳，小区无恙，心里还是很开心的，相信大家会理解的”组长高攀语重心长的说。

根据运营中心安排，所属翔达公司党员高攀、佟彤和金源公司党员尹波下沉马连道中里社区支援防疫工作。马连道中里社区为半开放式社区，既有南北

穿行的主干道，又有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出入口众多，需要工作人员分别把守，社区工作人员捉襟见肘。三人报到后立即投入工作，主动认领工作任务，了解社区工作模式，边干边学，很快就能独当一面，扛起社区防疫的大旗。

在对小区重点防控检查点值守和重点区域巡逻排查中，社区工作人员总会遇到熟人不配合，抹不开面子检查等问题。高攀三人严格遵守必检、必测、



必查的原则，认真负责，毫不马虎，分担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压力。由于高攀、佟彤两位同志离家较远，党员尹波又主动提出承担早晚班执勤工作，并帮助社

区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三人的通力合作，也得到了社区工作人员的高度赞许。

其实在运营中心下沉防疫的各个社区中，都或多或少遇到过群众不理解，不配合的问题，但我们的党员干部抗住压力，迎难而上，用自身行动去示范，用满腔真诚去劝解。面对困难时不抱怨，不怠慢，用坚定前行、无所畏惧的身影，汇聚起社区防疫的坚实力量，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夕阳西下，暮鸦归林。“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通行证，测一下体温”的话语再度响起。寒风中，三人胸前的党徽变得格外闪亮！

责任编辑：曾玉芬

信息来源：马连道中里社区防疫小组